

書寫下環：

灣仔的文化記憶



東華三院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策劃

策劃：

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

東華三院的歷史源遠流長，保存了大量歷史檔案和文物，有說東華三院是本地擁有最豐富文獻的民間機構。不少學者認為，研究東華三院的歷史檔案和文物有助他們了解香港，特別是華人社會的發展。東華三院於2010年成立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負責管理1970年成立的東華三院文物館（2010年成為法定古蹟）及2016年成立之東華三院何超瓚檔案及文物中心，藉推廣文物保育工作及提供文化服務，致力保護、開發及分享東華三院的歷史文化。

序言

中上環和下環（灣仔）是香港開埠之初已發展起來的地區。中環是港島的中心，政府山上有港督府（今禮賓府）、聖約翰座堂、政府合署（今已搬往金鐘）等地標式建築，山腳一帶銀行、洋行、商店林立，還有1869年和1962年兩代的大會堂，是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這佈局到近年才有所改變。上環是港島北岸最早形成的華人聚落，逐漸發展為華人居住、營商和消遣的地方，文武廟和東華醫院是華人在此區落地生根的歷史見證。中上環各有鮮明的特色，相比之下，灣仔更為多樣化，不同地段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特色。著名香港史學家施其樂牧師（Rev. Carl Smith）曾指出灣仔自開埠以來便一直在追尋不同的身份。隨著它的功能改變，它的身份也與時俱變，正因如此，它更值得我們作系統和深入的研究。

屈指算來，有關灣仔歷史發展的研究並不多，最有份量的首推施其樂的“Wan Chai: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收錄在他的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一書中。他根據經年累月在政府檔案處搜集爬梳的資料，鉅細無遺的闡述灣仔在不同時代的發展，資料詳實，學術性強，是認識灣仔發展必讀的文章。但除此以外，只有風物志一類讀物，資料尚算豐富，但深度不足，遑論啟發性了。東華三院的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素重視推廣香港歷史文化，它在2021年7月至12月舉辦了一個名為「文化沙龍系列：灣仔的文化記憶」系列講座，邀請了六位對香港歷史文化素有研究的人士，就灣仔的多個方面作出介紹，雖在疫情之中，仍然座無虛席，反應熱烈。其後，更邀請大家提交文字稿，結集成書於網上發佈，此為本書的緣起。

五位講者中以高添強最為資深，他從事香港史研究多年，涉獵範圍甚廣，尤專長於本地墳場和日據香港歷史研究，備受尊崇。他的文章〈歷史上的灣仔〉宏觀的闡述灣仔歷史發展，從開埠之初的海濱住宅計劃到貨倉、工廠、住宅，從日據前後的小東京，再到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大填海和戰後初期的蘇絲黃世界，帶領讀者走入灣仔的歷史時空之旅。高添強對香港軍事史十分熟悉，大家一向把位於金鐘的Canton Bazaar譯作廣州市場，文中他指出canton除廣州外，也可解作軍營，Canton Bazaar似應譯作駐軍市場，較為合理。這個新解釋解開了我多年的疑問，我一直懷疑華人的市場怎可能設於軍營林立的金鐘一帶？高添強熟諳日文，文中他引用了日文資料反映自十九世紀末，灣仔出現了大量日人經營的旅館、酒館、食肆和商店，有小東京之稱，目下的香港，也有大量的日式餐館和商店，但是已遍佈全港各區，並非集中於某地區了。

伍志和任職古物古蹟辦事處多年，是中國傳統建築專家，也對本地民間信俗素有研究。他的講座「皇后大道東上的洪聖廟與北城侯」，解開了我不少謎團。我經常在

灣仔近大道東一帶踳躑，不時經過洪聖古廟，對廟宇的石構件很感興趣，近年更發現原來廟旁水月宮的望海觀音木匾移開後，重新展現同治丁卯年仲冬吉旦的「北城侯廟」石額，原來比西環青蓮台的魯班先師廟還要早17年。我近年做過李陞昆仲有關研究，知道李陞在1871年曾當過洪聖廟的値理，但詳情未悉。伍館長的文章不單介紹了洪聖的來源，還詳細闡述了灣仔洪聖廟業權的轉變、北城侯廟與打石行業的關係，及從建築訊息解構洪聖廟的歷史發展，發前人之所未發，是迄今有關灣仔洪聖廟及北城侯廟最有深度的文章。其中論及建築架構的內容，充份反映了作者對中國傳統建築認識之深。灣仔的太原街的得名可能來自泰源石店，廟宇正門石額及對聯下款的樂邑鄧有元，可能是香港早年承辦打石業的重要人物鄧西元（元昌），這都是我沒有想到的。閱讀伍館長的文章，令我獲益良多。

盧淑櫻是我在中大任教多年的助教，我們還合著過《非我族裔：香港的非華裔族群》。這次，她聚焦於灣仔地區的醫療發展。她的講座和文章〈集善醫院的前世今生：戰前灣仔的華人醫療發展〉在她年前出版的《東華歷史散步》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灣仔地區華人醫院的興替，怎樣從華陀醫院到華陀廟，再從集善醫院到東華東院的發展過程。充份說明了人口增加帶動對醫療的需求。文中對華陀醫院、集善醫院和東華東院有詳盡的論述。我在年前應東華三院委托撰寫《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時留意到集善醫院同仁懇求東華接收，但東華未有即時答允，並在二十年代末才籌建了東華東院，低估了當年香港的經濟環境和東華面對的沉重財政負擔。盧博士在這方面列舉了當年內外交困的境況，補充了《善與人同》這方面的不足。作者花了不少篇幅闡述東華東院在戰前所設專科病房的服務，無論是產房、戒煙房、肺癆房，均能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香港社會和醫療面對的種種挑戰。

劉國偉唸工程出身，後來愛上了歷史，又讀了個歷史碩士學位課程，連職業也與歷史文化有關，可以學以致用。他集中闡述摩利臣山百多年的歷史，從山上的馬禮遜紀念學校、傳道會醫院、到灣仔大填海到摩利臣山剷平後的發展，可能是闡述這地區發展最詳盡的一篇文章。其中，尤以描述馬禮遜紀念學校及移山填海篇幅最多，也特別有意思。前者，他引用了*Chinese Repository*，一本十九世紀中葉廣州刊行的英文期刊資料，細述當年馬禮遜紀念學校的課程、學生生活和容閱、黃勝、黃寬和唐家三兄弟的求學經過和成就。而有關移山填海部分，論述灣仔填海的著述已有不少，工程專業出身的作者反而聚焦於1930年填海完成後至1950年代政府對摩利臣山的規劃這段較少人留意的片段，而目前摩利臣山的各種設施，正是該時代規劃出來的。作者還對曾在摩利臣山營業的兩間商店：曾福琴行和福祿壽殯儀館的位置作考證，饒有趣味。

黃競聰唸歷史出身，也從事與歷史文化相關的工作。我們每天在街道上行走，但對於街道名字來源，由甚麼機構命名，可能一無所知，遑論認識到街道命名可反映當時政府管治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氣候。黃博士的〈灣仔街道與香港政商名人〉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他的演講可以劃分為三個主要部分。第一部份介紹香港街道命名的管理機構和程序，即起初由工務局負責，戰後改由市政局負責，在1999年市政局解散後則地政總署署長獲授權為香港街道命名。其二是灣仔街道與香港政治名人，香港開埠初年，多以英國皇室成員、內閣部長或香港總督或高官命名，灣仔的堅尼地道和駱克道為代表，其三是灣仔街道與香港商人命名的街道，踏入二十世紀，華商崛起，購入大量土地，開始出現以華人名字或商號命名的街道，文章選擇了肇堅里及李節街作代表，深入闡釋，趣味盎然。

在這六位講者中，以鄺智文的年紀最輕，已是大學的副教授。鄺教授在過去數年間迅速崛起，成為研究近代東亞史和二戰前香港軍事史的表表者，他的講座和文章〈二次大戰期間的灣仔〉正是鄺博士素有研究、很有心得的題材，內容充實精彩。他的文章可劃分為灣仔的戰爭準備、香港戰役期間的灣仔、日據時期的灣仔三個主要部分。一如既往，他的研究利用了大量有關原始檔案，資料翔實，其中戰役期間的灣仔部分，作者從日軍侵港的首天開始，縷述日軍的步步進逼和灣仔在不同階段受到的攻擊。日據香港部分，作者加插了一些親歷者如港大圖書館的陳君葆和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的第一身見聞，讓讀者有親歷其境的感覺。作者引用李樹芬的記述，配合1943年香港電話局出版的《電話番號簿》，證實了日據時期慰安所的存在。對認識二戰前夕英軍的部署、日軍侵港的十八天戰役及日據時代港人生活，極具參考作用。

這六位講者的年紀從三十多到五十多歲不等，大抵屬於中生代；有任教於大學的，有在民間文化機構任職的，有政府博物館的館長，也有業餘歷史學者，彼此的研究重點不同，他們的文章反映出灣仔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不同面相。為了讓更多人分享六位講者的精彩內容，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把他們演講後提交的文章結集成電子書，在其專網發佈，謹綴數言以為序，誠意向廣大讀者推薦。

❧ 丁新豹 ❧

目錄

序	丁新豹	2
1. 歷史上的灣仔.....	高添強	6
2. 二次大戰期間的灣仔.....	鄺智文	17
3. 灣仔街道與香港政商名人.....	黃競聰	33
4. 摩利臣山沒有山.....	劉國偉	47
5. 集善醫院的前世今生：戰前灣仔的華人醫療發展	盧淑櫻	59
6. 皇后大道東上的洪聖爺與北城侯	伍志和	75
鳴謝		88

歷史上的灣仔

高添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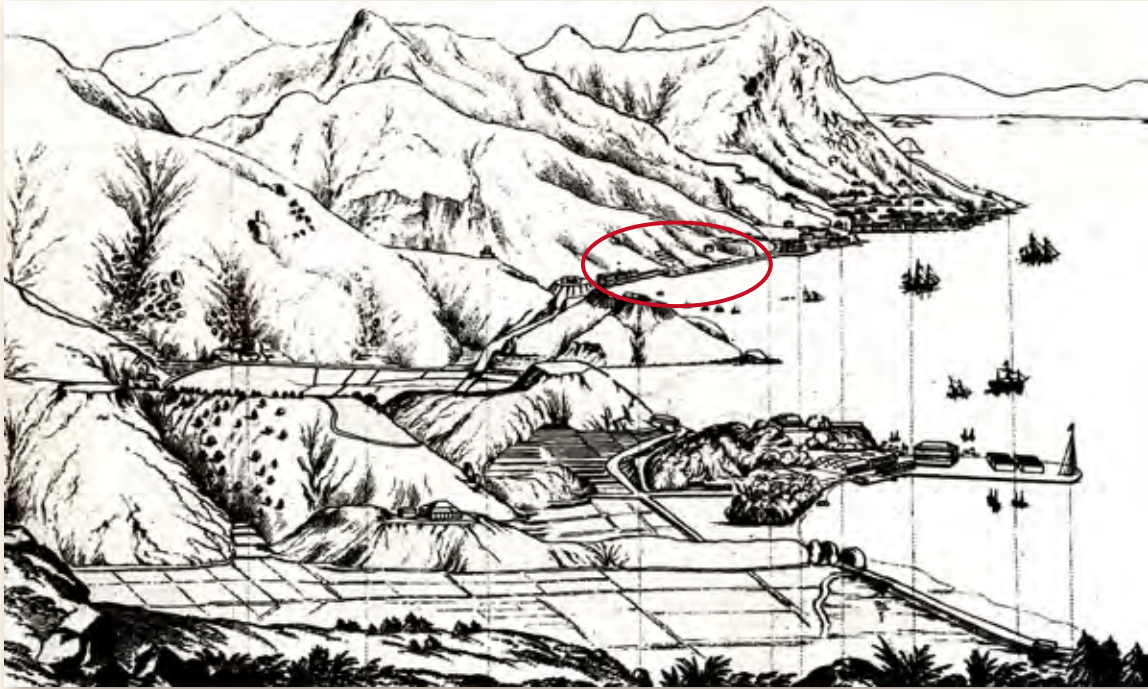
前言

過去百多年來，灣仔的經歷殊不平凡，中外混雜、多姿多彩的時空，可說是香港歷史的縮影。從早期海濱住宅計劃、貨倉、工業、平民住宅區乃至戰前「小東京」的發展進程，灣仔的身份不斷改變。它沒有中環的高貴，也沒有上環和西營盤的繁囂；其早期居民來自五湖四海，正好為灣仔添加不少國際色彩。二次大戰後，小說和電影《蘇絲黃的世界》令灣仔名聞遐邇，及後越戰更把灣仔的名聲推向高峰。過去三十多年來各界著力重塑灣仔身份，情節待續。

海濱住宅計劃

根據英國人登陸港島後所作的第一次人口調查，現今稱作灣仔的地區，開埠時並沒有常住陸上居民的紀錄，更沒有任何村落的記載。這當然不是說灣仔杳無人煙，根據學者推測，現今洪聖廟及船街附近或許在開埠前已有少量漁民聚居。

開埠初期，港府沒有預計大量華人將會湧進香港，本有意把灣仔的海旁地段開發為高尚的海濱住宅區。早在1842年，美籍商人紀士拜（Charles Gillespie）已在今天皇后大道東灣仔環境資源中心（當時離海濱尚不遠）建了一所住宅，共有六個房間，附設大陽台。其後數幢外觀相若的大宅先後在附近落成，遂成為港島最早出現的歐式住宅建築群。當時的開發者更把附近一帶開闢為花園，栽種花木，並引注後面小丘流至的山水入園，這就是該地「泉水花園」的英文（Spring Gardens）原意，因此並不是「春園」。1848年第三任港督般咸（Samuel George Bonham）抵港後，因官舍尚未興建，便從某商人租來「春園」的一座大宅作暫居之用。當時受英國皇家園藝學會所託、前來中國採集植物標本的著名植物學家科廷（Robert Fortune），便盛讚該處的花園異常漂亮。



▲ 香港島北岸地形圖，紅圈所指即為「春園」，繪於1845年（圖片由作者提供）



▲ 「春園」一帶景色，繪於1846年（圖片由作者提供）

談到誤譯，幾乎所有有關香港歷史的書刊，都把開埠初期設於金鐘軍營之間的市集（當然當時尚未有「金鐘」之名），稱為「廣州市場」。估計這是因為該市集英文名字為Canton Bazaar之故，早期的譯者便直譯作「廣州市場」。惟Canton除指廣州外，尚有軍營之意（尤指臨時軍營），因此Canton Bazaar很可能是「駐軍市集」，而不是甚麼「廣州市場」。

疫症盛行，加上時人對熱帶病毒傳播途徑的認識仍相對貧乏，造成大量軍人死亡。開埠第一年病歿的英軍已高達183人，設置合適的墓地遂成為政府當務之急。1841年8月底，負責工務的港府官員發出告示，在灣仔今天永豐街、星街一帶設置香港首處西式墓園。1842年4月，羅馬天主教會亦獲政府於灣仔墓地旁撥地（約近今天秀華坊），以安葬天主教徒。其後教會開始在灣仔設置棄嬰所及醫院等機構，為香港這片新興殖民地提供社會服務。馬禮遜教育會亦於1843年在灣仔另一端、其後稱為摩利臣山的崗上開辦學校，然而由於經費不繼，學校無奈於六年後停辦。

貨倉、工業、住宅

開埠初期的貿易發展不似預期，部分商人乃至政府官員，對香港前景不再抱有希望。1845年8月，三十一家英商甚至聯名上書英國殖民地大臣，說香港已無商可營，島上只可供作港府及其官員駐節之地，並收容一批身無長物的貧民而已。不到一年，灣仔的海濱住宅發展計劃被迫草草收場。

其後數年，影響深遠的歷史大事給香港帶來機遇，使經濟得以慢慢走上軌道。

1848年美國加州發現金礦，需要大量人手開採，同一時期還有華人赴秘魯、古巴和南洋等地當勞工。船隻載客出洋，回程又運載大批貨物返港，激活了香港的經濟。1851年澳洲又發現金礦，續有大批華工經香港前往當地。

同年，太平天國在廣西崛起，並迅速擴展。及至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炮轟廣州城，城內居民憤怒燒燬十三行，當地商人相繼逃離廣州。數年間大量資金和人口為避亂湧入香港，令經濟起了新的變化，商人重燃對香港貿易前景的信心，外商於焉重臨。

因應貿易發展，「春園」以東的「醫院山」（今律敦治醫院一帶）漸漸成為貨倉區，這亦意味工作機會所在。隨著人口及貨運增加，港府乃開發今天石水渠街一帶為華人住宅區；兩間大型廟宇洪聖廟及玉虛宮相繼在1840年代及1860年代在當區建成，標誌著華人在灣仔落地生根。



▲「醫院山」臨海地段，攝於約1858年（圖片由作者提供）

另一方面，從開埠起，軍方即不斷在今天金鐘一帶設置軍營、船塢和其他軍事設施，這使灣仔與中、上環分隔，其商業發展因而嚴重受阻。此外，各式工業包括糖廠、船廠和麵包工場等雖然在灣仔海旁建立，但最後都未能壯大。例外的是1889年落成的香港第一所發電廠，不過二十年後因電力需求增加，電燈公司遂於1913年選址北角興建新的發電廠，留下來的只有日街、月街、星街（取自《三字經》中的「三光者，日月星」）、光明街及電氣街的街道名字。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灣仔主要是一個夾雜住宅的貨倉區，海旁隨處可見用作上落貨物的小碼頭。



▲灣仔海旁一帶住宅及貨倉林立，攝於1890年代（圖片由作者提供）

天主教會在當區開展多方面的服務，吸引一些外籍人士到灣仔居住，其中尤以葡裔人士為最，也有過去與他們有商業往還的不同國籍人士，如菲律賓、印度（包括葡屬果亞）及非洲各地。早期灣仔的外籍居民，還包括來自當時香港歐人社會中的低下層，如警察、獄吏及政府的下級文職人員。部分早年灣仔居住條件較佳的樓房，便是為這些人士而建。

小東京

踏入二十世紀，隨著九龍開發，大部分無緣居於山頂的富有外籍居民漸漸移居九龍，又或上遷堅尼地道一帶新建的大宅，日籍居民則在山下取而代之，成為灣仔的新群體。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灣仔儼然成為香港的「小東京」，舉目皆是日人開設的商店、旅館及酒館。

自開埠起，不論官方或民間，香港與日本即往來不斷。除一般的經濟、政治及軍事接觸外，日娼亦構成這些交往重要的一環。二次大戰前任職日本駐港領事館的外務省官員奧田乙治郎，更毫不諱言指出，就居港日人的經歷而言，其中一半都是這些「娘子軍」的事蹟。有學者概括日本對亞洲的侵略：首先是娼妓，接著是藥商，最後是軍隊。

香港歷史上曾有兩段時期（1857至1894年及1900至1932年）實行公娼制，故當時開設妓院完全合法。

早自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撤銷國民渡航海外禁令後，即開始有來自貧農家庭（特別是九州）的日本婦女，遭人口販子以種種花言巧語誑騙出國，最終在飽受威迫、恫嚇下被賣至妓院，墜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其實十九世紀後期乃至二十世紀初，由日人經營的店舖，如服裝店、美容院、首飾店、照相館、飲食店、旅館、診所等，大都或多或少與娼妓有關，難怪奧田慨嘆，那時居港日人幾乎全以「娘子軍」為中心而營生。

二十世紀初，隨著海上交通發展，走出國門往外地尋找機會的日本國民漸漸增加。1902年英日締結同盟後，兩國關係空前良好，到香港工作和居住的日人較十九世紀後期大幅增加。他們眼中的香港，是一個先進的港口城市；在英國人治理下，百貨匯集，市面繁榮，且充滿異國情調。煤氣、電燈、電話、水道等城市建設，式式俱備，香港已由一處蠻瘴癘疫之地，發展為世上屈指可數的大商港。

1910至1920年代，居港日人平均約為1,500人，至1930年代增加至約1,800人。日僑人數雖然不算多，惟由於所屬階層不同，長期以來均分為兩群：小部分居於半山，以領事館人員、大商業機構的職員和家眷為主；大部分屬中下層的日僑則居於灣仔。



◀ 在港的日本女子，攝於1896年（圖片由作者提供）

從十九世紀末起，大量不同國籍人士在灣仔聚居，部分華洋娼妓開始遷往該地營生，日娼亦開始由中上環一帶東移至灣仔，而由日人經營的旅館、酒館、食肆和商店，亦跟隨妓女在灣仔落地生根。

1919年於東京出版的《香港概觀》中，編者對當時灣仔的日本娼妓有以下描述：

娘子軍及紅裙隊的大本營在灣仔舢舨街，狹窄的街巷內，軒燈煌然，成排搖曳，歐陸式的樓房，改裝成和式的店子。店頭擺放著一排椅子，營造出奇特的風貌。紅綠色的燈泡發出斑斕的光芒，婦女就在夜幕下強顏歡笑……

另一位日本旅行家、出版人坪谷善四郎早於1903年訪港期間，亦以不屑的筆觸寫下日娼在灣仔的情形：

……飯後在森（坪谷在港的友人）的陪同下到訪灣仔，我們走進一家狀似大工廠的建築物二樓，屋內彎曲的通道兩旁，並排著幾十間小房子，每間房子都有一兩名日本婦人，有些穿浴衣，也有些穿著像護士裝束的服飾，髮型有卷髮並結上左右兩個鴉髻的、束成牛糞狀的，還有其他奇形怪狀的，這些怪物都像冬瓜般塗得發白，她們手執團扇，向過路的人搭訕，招引他們進去休息。踏入這些魔窟的人客有白人水手、事務員，也夾雜著中國人，惟有日本人極為罕見……我實在不忍長時間看見她們在異地討白人和中國人的歡心，因而匆匆返回住處。

東和棧	澳門來發號	永昌和	義昌號	馮佐廷	林杰齋	近江屋嘉兵衛	鍵屋藤樂	大戶屋傳治郎	增田屋嘉兵衛	榮記號	聚英樓	恒信號	永豐號	裕源號	聯勝號	廣順泰
裕昌	羅煜甫	譚忠恕堂	梁麗堂	繆輝堂	梁縉堂	香邑陳光遠堂	棉屋政吉	平島屋喜兵衛	棉屋政吉	榮泰棧	廣榮押	成記號	聯和號	東陽號	三記號	廣安昌
均昌隆	胡文龍	東同泰	魏學松	廣萬泰	阮月湖	胡汶泉	伏見屋瓶治郎	富屋善兵衛	松屋伊助	怡和號	泰榮號	福源號	典記號	廣生號	同昌號	同升號
和興號	阮文遠	此山中	廣福昌	黃朝英	廣裕典	馮錦然	村田屋喜八	富屋半右衛門	諏訪屋喜平次	浩源號	生隆號	楊如記	區德威堂	鴻源號	裕和號	華源號
恒和號	陳希曾	王炳	盛幹臣	廣裕典	馮錦然	鮑彥卿	陳瑞章			橫濱富盆屋長兵衛	大生堂	天元號	杏花樓	和記號	合記號	廣泰隆
	永和昌藥材店	陸夢松	鄧功懋	馮錦然	鮑彥卿	盛鳳生				大板屋銀藏	聯泰號	酒和號	聯昌號	萬利號	江源昌	廣行號
	怡發肉棧	何順進	黃沛泉	鮑彥卿	盛鳳生	公典隆					贊寧堂	遠芳樓	恒和號	廣昌隆	協和號	岐生堂
			胡達朝	鮑彥卿	盛鳳生						廣昌榮	德和號	天玉號	同和號		

◀《癸酉年（1873年）東華醫院徵信錄》內「局內同人芳名臚列」部分，列有數位日人及日商之名，側證日人可能早於開埠初期在港已有一定程度的商業活動及資產（圖片來源：東華三院文物館）



▲ 在灣仔由日人經營的鐘錶金器商店，攝於1922年（圖片由作者提供）

大填海

為舒緩中、上環土地不足的困局及重建灣仔較早發展的地段，港府於1921年招商承辦灣仔海旁東填海計劃 (Praya East Reclamation Scheme) 之工程。填海範圍由海軍船塢以東的軍器廠街開始，至銅鑼灣怡和洋行貨倉止。由於範圍非常大，工程的艱鉅並不亞於十九世紀末中環的填海計劃。項目最終由一間名為生利的公司，以330萬元這個在當時可說是天文數字的金額投得。

由於填海工程的標書指定以摩利臣山的沙土作填海之用，灣仔地貌自此出現重大改變。填海期間，承辦公司特別鋪設輕便路軌，以方便工人運送沙石至海旁。然而當開鑿以後，承辦公司才發覺摩利臣山的下部多為堅硬的岩層，這不單令填海工程暫停下來，更使費用大幅上升，摩利臣山亦因上述的原故，到戰後才給完全剷平。經過多番考慮，港府終於接納增加工程費用的要求，承辦公司亦得以僱用船隻往九龍各處載運沙土，繼續餘下的工程。另一方面，1925年至1926年間發生的「省港大罷工」，對灣仔填海計劃亦有一定的影響。整個項目的總支出最後上升至540多萬元。

1929年，填海工程終於完成，灣仔面積增加了三十六公頃，可供開闢較寬大的街道及興建居住環境較佳的樓宇。多條新街道相繼建成又或擴闊，包括軒尼詩道、告士打道、謝斐道、駱克道、分域街、盧押道、柯布連道、譚臣道、史超域道、菲林明道及杜老誌道；東海旁（今天莊士敦道）亦得以重建。其後十年，灣仔的新填地容納了大量因內地局勢動盪而遷港的新移民。1929年的世界經濟恐慌亦令不少華僑把

資金調來香港，並在灣仔特別是駱克道一帶置業。自此，灣仔的新填地得以慢慢的發展起來；數年間海軍會所大樓及六國飯店相繼建成，並迅速成為灣仔的地標。



▲ 1930年代的灣仔已經發展蓬勃，高樓處處可見（圖片由作者提供）

然而好景不常，大戰爆發後，灣仔在十八天的香港保衛戰中成為戰場，當香港守軍於1941年聖誕日投降時，港島北岸的停火線便是灣仔的柯布連道。日佔期間，灣仔因鄰近海軍船塢及金鐘軍營而不時遭受美機轟炸，造成大量居民傷亡，其中尤以1945年初的數次空襲令當地居民死傷慘重，灣仔為戰爭付上沉重的代價。

蘇絲黃的世界

1957年，英國作家美臣（Richard Mason）以灣仔為背景的小說《蘇絲黃的世界》面世；一年後，紐約百老匯及倫敦的劇院相繼上演這齣描述灣仔吧女生涯的舞台劇。1960年，由關南施（原名關家倩）及荷里活男星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主演的同名電影公映，並掀起熱潮。自此，灣仔頓時變成香港最為世人所知的地區；灣仔的紅燈區形象自此歷久不衰。其實灣仔的娛樂及色情事業早在二十世紀初娼妓合法化時期已出現，地點主要集中在汕頭街、舢舨街及春園街一帶；大戰期間，駱克道更是日人指定的娛樂區。

韓戰（1950至1953年）時期，香港成為聯合國軍的休假區。由於軍人大都是從分域街盡頭處的小艇碼頭登岸，他們因而經常流連附近的酒吧及夜總會。美臣就是在韓戰結束後的三年，在灣仔的酒吧流連數月，觸發靈感，寫成小說；灣仔頓時蜚聲國際。



▲ 多艘軍艦停泊在灣仔對出海域，攝於1950年代（圖片由作者提供）

越戰（1965至1975年）爆發把灣仔在這方面的發展推向高峰。除酒吧夜總會外，數量眾多的休假軍人同時亦滋養了灣仔的其他行業，如裁縫、洗熨、紋身、飲食及電影院等，生意興旺得很。1960年代灣仔電影院可說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當中包括東方、國泰、東成、香港、國民、環球及麗都等；以數目來說，這在香港可算數一數二。



▲ 位於灣仔馬師道的國民戲院，攝於1955年（圖片由作者提供）

新形象

在灣仔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的開發歷程中，不便的陸上對外交通，特別是金鐘的「樽頸地帶」，一直是阻礙其商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不過自1958年起，隨著金鐘一帶的軍事設施如海軍船塢及軍營遷移，灣仔至中環的東西交通得到重大改善。1961年，夏慤道建成；不久，皇后大道東近舊海軍船塢一段的擴闊工程亦告完成，並改名金鐘道，灣仔另一階段的發展得以實現。

從1965年起至1972年，港府在灣仔再次展開大型填海計劃。工程完成後，灣仔的範圍隨即伸展至今天會議道一帶；港島北岸的海岸線自此完全改觀。1968年，行政局通過灣仔的舊區重建計劃，皇后大道東兩旁的舊廈，在其後的十多年間，大量拆卸重建。這段時期，香港正經歷「經濟起飛」，社會普遍對工商樓宇需求甚殷。中環區的商業樓宇供不應求，商業活動因而向東擴展，灣仔的填海與重建，正好回應這一趨勢。另一方面，當時香港亦從「文化沙漠」，逐步走向文化活動百花齊放的年代。就在這形勢下，灣仔一向以來的形象開始出現改變；十數年間，灣仔面貌一新。



▲ 灣仔填海前的臨海地段，如今左起的海員俱樂部及中國海軍俱樂部均已改建，只剩下香港警察總部堅偉樓依然屹立，攝於約1965年（圖片由作者提供）

1972年，標誌著灣仔新時代到臨的新水星大廈於新填地落成。五年後，香港的第一所藝術中心在同一幅土地上出現。往後十多年，一座座耀眼的商業大廈、政府辦公大樓、酒店、運動場館乃至演藝學院相繼在灣仔海旁建成。從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中環廣場先後落成啟用，兩座建築物迅即成為香港的象徵之一。1997年，舉世矚目的香港交接儀式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舉行，為灣仔故事添上劃時代的新情節。

中外混雜原是灣仔百多年來最大的特色，這大概也是香港的寫照，灣仔面貌改變帶來的將是什麼？這可能值得大家細想。

二次大戰期間

的

灣仔

鄺智文

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灣仔區歷盡戰爭準備、日軍侵略、盟軍空襲，以及重光的過程。這個以商住為主的地段，不幸成為戰爭的最前線，又成為大規模空襲的目標。本文主要基於2021年11月6日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舉辦的「二次大戰時的灣仔」講座，以及運用檔案和其他資料，為1939至1945年的灣仔歷史作補白。本文所述的「灣仔區」，部份地段可能與當時的理解有所出入，但為方便討論，則以大約今日區議會區域為限，但不包括跑馬地以南的金馬倫山、聳高信山一帶。

灣仔的戰爭準備

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日軍陸續於1937至1939年間佔領廣州、海南島等地，使香港無形中被日軍包圍。英國政府對香港的防務政策逐漸由增援香港改為以之為前哨，並透過和美國合作以威懾日本¹。香港當時雖然未有面對即時危險，但居民亦從新聞報導、親友消息，以至不斷湧入的難民察覺出戰爭逐漸迫近，亦有不少記述提到市民抱持「鴛鴦」心態，繼續度日²。1939年歐戰爆發，香港在亞洲全面開戰時獲得增援的機會更為渺茫。在香港的英國海陸軍有見倫敦政府以星加坡和馬來亞為優先，香港只能獲得少量物資支援，因此一方面嘗試要求更多資源以備日軍進攻，另一方面則開始為香港增加防禦工事，並制定相關計劃（詳見下節）。這些防禦工事包括砲台、高射砲陣地、機關槍堡（pillbox）以及掩蔽部等³。由於灣仔區緊鄰金鐘的海軍船塢和中區的其他軍事設施，亦是中區的東面入口，因此守軍亦於此地佈防。

1 詳見鄺智文、蔡耀倫，《東方堡壘：香港軍事史，1840-1970》（香港：中華，2019），頁213-251。

2 唐海，《香港淪陷記》（上海：新新出版社，1946 / 香港：心一堂再版，2020），頁1。

3 鄺智文、蔡耀倫，《東方堡壘：香港軍事史，1840-1970》，頁196-210。

在灣仔，英軍在海旁和街角興建了一共八個機關槍堡，編號由53至58A，具體位置如下⁴：

名稱	地點	備註
PB 53	銅鑼灣英皇道高士威道交匯處	槍眼三個向北與西北
PB 54	掃桿埔電車站	槍眼三個；今怡和街
PB 55	東角煤倉	槍眼三個；今告士打道
PB 56	杜老誌道碼頭	槍眼四個；今杜老誌道
PB 57	機利文車庫	槍眼三個；今軒尼詩道及莊士敦道交界
PB 57A	菲林明道	槍眼四個
PB 58	海軍俱樂部	槍眼三個
PB 58A	皇后大道東、軒尼詩道與金鐘道交界	槍眼三個

從Harrison Forman於1941年拍攝的照片可見，這些機關槍堡被漆成灰白色，可能是為了把機槍堡融入附近的建築物之中。至於灣仔海皮的機槍堡，現存照片顯示部份亦被漆成迷彩，但顏色和效果不明。



▲ 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和軒尼詩道交界的PB58A機槍堡，攝於1941年（圖片來源：Harrison Forman Collection,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Libraries）

4 詳見鄭智文（2021）。1941年香港戰役地圖。檢索於2022年2月20日，取自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史庫》：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1941hkbattle/zht/data.php?show=list&find-in=HK1%20Pillboxes>

1939年，香港成立防空署（Air Raid Precaution），師法英國防空署，開始建立專為防備空襲而設的民防隊伍，但港督羅富國（Geoffry Northcote）始終認為香港不應設防⁵。1939年8月，香港紳商組織「港僑自衛團」，並於各區設「區長」一職，於10月7日正式成立，其中灣仔區自衛團亦於同日成立，當時區長為周伯添⁶。1940年5月，羅富國因病離港，接任的護督本來是輔政司史美（Norman Lockhart Smith），其後則改為馬德拉斯軍區司令（G.O.C. Madras）岳桐陸軍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Edward Felix Norton）⁷。岳桐上任後即著手香港的民防工作。1940年8月，防空署研究在山邊開鑿隧道以興建防空洞。當時防空署估計香港島人口有800,000人，其中灣仔有240,000人，其中絕大部份自然是華人。防空署總監史柏堅（Alfred Steele-Perkins）認為將有百分之十五的市民會因為戰爭將臨而離開香港，因此在灣仔需要考慮為204,000人提供保護。最初的計劃為上述一半的人口提供沙包陣等掩體保護，地點為軒尼詩道、告士打道、堅拿道西、禮頓道，以及波斯富街⁸。由於防空署認為在市區挖掘壕溝成本太高，因此決定興建防空掩體和防空牆，灣仔和港島市區亦有不少這些建築。它們的外牆由空心磚建成，空心磚之中灌有泥沙，作用和沙包類近，但空心磚由水泥固定。防空署署長史柏堅聲稱這種防空牆可以抵擋500磅炸彈在50呎外爆炸所產生的碎片和玻璃。掩體的頂部則由預製組件構成，可抵擋機槍子彈，即可以抵擋飛機低空掃射⁹。從歷史照片可見，至少在修頓球場、寶靈頓運河附近均有這些防空掩體，部份大街上則有防空牆。



▲ 位於灣仔修頓球場附近的「第233號避難室」防空掩體，可容納152人，攝於1941年（圖片來源：Harrison Forman Collection,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Libraries）

5 鄭智文、蔡耀倫，《東方堡壘：香港軍事史，1840-1970》，頁225-226。

6 「灣仔區自衛團成立」，《香港華字日報》，1939年10月8日，頁7。

7 "LT.GEN. NORTON: Former Governor of Colony DEATH IN ENGLAND," 8/11/1954, SCMP, p. 8.

8 "Memorandum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CO 129/589/4,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pp. 1-2.

9 "A.R.P. PROGRESS: Tunnel Construction Well Ahead of Schedule," 30/11/1940, SCMP, p. 7.



▲ 位於中環得名大酒樓附近的防空牆，攝於1941年（圖片來源：Harrison Forman Collection,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Libraries）

在1940年至1941年間，香港政府（羅富國於1941年3月回港¹⁰）繼續推動民防工作。至9月，羅富國離任，楊慕琦（Mark Young）接任港督，他到任後即加強組織民防工作。當時，新任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少將（Major General Christopher Maltby）亦到港履新。他對香港政府的民防工作頗為不滿，於抵港後不久即於其家書中提到：「港督（羅富國）病重，只想低調離港，但這裡有大量民防工作尚未完成。恐怕我一開始就會要求多多。」¹¹。楊慕琦到任後，顯然亦有類似看法，因此香港政府在9至11月間推行了不少行動。其中與灣仔有關的工作除了防空救護站外，亦在灣仔街市（建於1937年）旁邊設立公共飯堂在緊急狀態時為貧苦市民服務。1941年9月15日，灣仔公共飯堂試行運作¹²。至11月，政府把貝夫人健康院（Violet Peel Health Clinic，今日修頓體育館位置）和摩理臣山劃為疏散區，供沒有戰時工作者暫避¹³。

10 "GOVERNOR RETURNS: Representative Gathering at Queen's Pier SIR GEOFFRY NORTHCOTE," 14/3/1941, SCMP, p. 8.

11 "Excerpt of Letter of Christopher Maltby," 20/7/1941, C. M. Maltby Scrapbook, Imperial War Museum Archive, IWM 22835.

12 「灣仔公共飯堂今日下午售飯」，《大公報》，1941年9月15日，頁6。

13 「華民政務司昨發出戰時準備緊急通告當局劃定疏散區八處」，《大公報》，1941年11月25日，頁6。

香港戰役期間的灣仔

自1889年起，英軍撰寫並不時修改《防衛計劃》(Defence Scheme)，以對應不斷轉變的國際形勢和科技變遷¹⁴。在1936年以前的《防衛計劃》中，守軍在港島主要守住山脊和山峽，並無太多關於灣仔的內容。1939年的《臨時防衛計劃》(Interim Defence Scheme)中，今日的「灣仔區」屬於守軍港島防區的「西北」地段。該地段由堅尼地城起至銅鑼灣(防衛計劃稱「寶靈頓」)為止，屬於港島的核心區域。「西北」防區分為「左」、「右」兩翼，其中左翼為上環至香港大學一帶，右翼為灣仔，計有三個排級防區，包括約巴理士山(Mount Parish，即海軍醫院一帶)、灣仔(海軍俱樂部一帶，鄰近皇家海軍船塢)，以及堅尼地道(軒尼詩道和軍器廠街交界，PB58A附近)¹⁵。此外，守軍在灣仔有兩個砲兵陣地，即加路連山以及虎豹別墅附近，兩處均有兩門6吋榴彈砲，隸屬香港星加坡皇家砲兵團第25中型砲連¹⁶。此外，位於大坑的東華東院則於會戰時成為印軍醫院，由皇家印度陸軍醫療團人員運作¹⁷。灣仔的防空主要由港島北岸的高射砲台(西灣、黃泥涌峽、松林、摩星嶺四個高射砲台)負責，在灣仔區則於海軍俱樂部有兩挺李維士機槍，由防衛軍第6連(葡裔)人員操作¹⁸。

1941年12月6日，守軍動員，醉酒灣防線的部隊開始戒備，在新界的前哨部隊亦準備行動。港島守軍則加強各自的防線，其中負責守備港島海岸線的米杜息士團第1營(1st Battalion, the Middlesex Regiment)將其營部移至禮頓山，該地地勢較高，其上有四座政府宿舍，可以控制銅鑼灣避風塘、大坑至灣仔一帶，而且山勢自北向南延伸，不會過份暴露在來自北面的砲火之下。米杜息士團第1營的指揮官為史釗活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Henry Stewart)，他將於香港戰役期間實際指揮灣仔地區的所有英軍。



▲ 1939年地圖中的禮頓山(紅色方格)；地勢模型為2022年，因此與當時實際高度有少許出入(圖片來源：1941年香港戰役空間史研究計劃)

14 詳見：鄭智文，「從後裝砲到核武：「自由軍國主義」、「戰力差距」與英國在香港防務，1878-1958」，收入於麥勁生(編)。《近代中國海防史新論》9(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頁480-499。

15 "Part II – Section E," *Hong Kong Defence Scheme 1941*, Museum of Coastal Defence, paragraphs 1-3.

16 "Part II – Section E," *Hong Kong Defence Scheme 1941*, Museum of Coastal Defence, paragraphs 4-5.

17 Donald C. Bowie, "Captive surgeon in Hong Kong: the story of the British Military Hospital, Hong Kong, 1942-1945," Wellcome Collection, RAMC/1291/8, p. 159.

18 "Part II – Section J," *Hong Kong Defence Scheme 1941*, Museum of Coastal Defence, chart 1.

8日上午，日軍轟炸啟德機場、深水埗軍營，以及九龍灣的船隻。守軍在新界邊戰邊退，並準備在醉酒灣防線準備抵抗一段時間，為港島守軍爭取更多時間準備港島防務。可是，日軍在9至11日先後突破城門碉堡和金山的英軍防線，使守軍決定把部隊從九龍撤回港島。在此期間，港島北岸尚未被攻擊，灣仔沿岸的機關槍堡亦未有守軍駐防。正當守軍自九龍撤退時，為防港島治安崩潰或親日幫會破壞，英軍向國民政府在港代表陳策海軍中將請求組織親國府幫會協助維持治安。陳策遂組織「香港中國抗戰協助團」(ABCD Chinese Corps)，其中一個指揮部即設於跑馬地，其人員在跑馬地—灣仔一帶活動¹⁹。與此同時，民防人員如警察、輔助警察，以及防空救護員等仍在運作。例如，聖約翰救傷隊在灣仔街市設有救護站，為官兵和市民提供急救服務²⁰。

12月11日，鄰近灣仔的海軍船塢被日軍砲擊，灣仔成為戰場²¹。至13日，九龍和新界的守軍全部退回港島，守軍根據《防衛計劃》重整港島的防禦。13日開始，灣仔被砲轟，目標是沿岸的機關槍堡。由於日軍已佔領尖沙咀，因此可以從海皮觀測這些機關槍堡的位置。香港警察的戰時日誌提到砲火損毀軒尼詩道、軍器廠街，以及海皮的房屋並造成死傷，又擊毀多個機槍堡。在修頓球場附近排隊購買食物的市民亦被波及²²。警員發現未爆彈的尺寸為150毫米，即日軍第1重砲隊屬下兩個砲兵大隊的大砲口徑²³。其時，日軍已佔據新界和九龍，正與英軍隔著維多利亞港對峙，守軍推算日軍可能自東北岸登陸，因此部署英印陸軍拉吉普營(5th Battalion, 7th Rajput Regiment)防守北角到愛秩序灣的海岸線。可是，由於日軍砲兵的威脅，守軍亦不能把大量部隊配置於東北岸，所以拉吉普營的防區多少顯得單薄。至於灣仔，12月15至16日守軍大致部署了如下的部隊²⁴：

- 1. 禮頓山：**米杜息士團第1營營部，另外由營部和補充兵組成的Z連防守禮頓山，正加強陣地。
- 2. 大坑—加路連山：**印軍拉吉普營B連
- 3. 巴里士山、海軍醫院：**蘇格蘭營D連
- 4. 反砲擊部隊：**香港星加坡皇家砲兵團第25中型砲連的四門6吋榴彈砲，各有兩門在加路連山以及虎豹別墅附近

19 陳安國編，《陳策將軍紀念集》(2011)，頁243。

20 "Report by Samuel Szeto, Acting Corps Superintendent, The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Hong Kong,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CO 129/590/25, p. 1.

21 "Police War Diary," Reports on Current Situation: Police: 1945 Nov. 14-1946 July 1, CO 129/592/4, TNA, p. 17.

22 CO 129/592/4, TNA, pp. 29, 35.

23 CO 129/592/4, TNA, p. 29.

24 鄺智文(2021)。1941年香港戰役地圖。檢索於2022年2月20日，取自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史庫》：<https://digital.lib.hkbu.edu.hk/1941hkbattle/>

12月15日至18日日間，日軍猛烈砲轟灣仔海皮，除了機槍堡中彈外，灣仔警署亦被擊中多次。日軍亦砲轟大坑以至虎豹別墅一帶，因該處有英軍砲兵陣地（後者於15日轉移至赤柱峽）。由於日軍砲彈大多是75毫米山砲和野砲，因此未有對警署造成結構性損毀²⁵。可是，砲轟卻對鄰近房屋造成重大破壞。1933年出生的鄧德明家住莊士敦道180號，其家族經營的印刷店就在居所樓下。鄧德明回憶他的家在戰鬥期間被日軍炸毀²⁶：

1941年12月18日，我們店舖附近被炸彈炸中，雖然炸彈沒有炸毀我們的店舖。但爆炸的震盪使我們的店舖倒塌下來。那時候一般人住的都是約有三層高的木屋，在街上投下三、四枚炸彈便會令房屋倒塌。我們的店舖倒塌當日正是中午時分，約11時左右。我們當時已經趕不及到防空洞，雖然聽到炸彈聲但不敢出外察看，只怕被炸彈的碎片擊中。我們全都躲在機器底下，店舖倒塌後，我們一家和夥計都被倒塌的木板壓着，無法動彈。我們被壓了差不多兩小時，直到解除警報之後消防員才來救我們。由於消防局就在我們家的對面，故此他們很快便來到管救我們，消防員在廚房的後面用鐵筆撬開鐵枝後才能把我們救出來。後來我們知道日本人原來想轟炸消防局，因為那裏插着一面英國國旗，結果害得我們的樓房倒塌。（日軍當時應該在砲轟海軍醫院）被壓的時候我們都很辛苦，母親一直捉着我的手。幸好當時投下的不是燃燒彈，不然我們在木造的房子裏一定必死無疑。

被困期間我們滿身都是又灰又黃的泥巴，別人只能看見我們的眼睛、最子和嘴巴。我們當時都不能張嘴說話，因為身上有很多泥巴和灰塵，就像吃了炒米餅後沒有喝水一樣。嘴巴十分乾涸。當時我們有兩名夥計被太多東西壓着，一時無法搶救出來。大家只好透過木板間的空隙把餅乾和食水傳給他們，結果兩個人被壓了差不多20天才被救出。幸好店內有一部印刷機頂着那些塌下來的木板，否則我們全都會被壓死。我父親因為離開了店舖往外走，結果被炸死。當時政府看到屍體會立即派人到街上收拾，因此我們找不到父親的遺體，也不知道他葬在哪裏。鄰近的店舖亦有20至30人死亡，房屋倒塌後整條街都很臭……

25 CO 129/592/4, TNA, p. 36.

26 劉智鵬、周家建《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頁161、162。

18日晚上，日軍登陸港島東北岸，在數小時內逾六個步兵大隊和輔助兵力約6,000人上岸，突破了拉吉普營的防線。英軍司令部派出米杜息士團人員前往北角支援，但在英皇道發電廠附近被日軍截擊，退到發電廠繼續抵抗。在大坑的拉吉普營B連曾派出一排前往支援寶馬山賽西湖的D連，但亦被擊退。北角的日軍（主要屬於第38師團步兵第230聯隊的官兵）未有繼續沿英皇道前進到銅鑼灣，而是向山上進發，沿金督馳馬徑到達黃泥涌峽，和該地的守軍激戰²⁷。

當時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任職，家住跑馬地鳳輝臺的陳君葆在日記中記述了兩軍在香港島交戰時他在家中的經歷：「被困已十日了。晨八時起便聞空襲。九時早飯在機聲與槍砲聲中極鎮靜中畢事。十時轟炸中發現銅鑼灣方面起大煙，料火油倉已遭炸了.....整日砲擊轟炸至七時猶未已.....晚砲轟極烈至十時後始稍止²⁸。」19日，他寫道：「侵晨聞山後機槍聲，又夾以高射砲聲，空中微聞機聲大略是降傘隊也說不定。.....早傳來登陸消息，北角乙帶機槍聲自遠而近，整日如此。入夜電燈不明，在黑暗中胡亂睡去，也若斷若續地聞山後砲聲²⁹。」

19日上午，大坑—灣仔—跑馬地一帶仍然在英軍手中。史釗活中校要求灣仔的警察配備輕機槍到前線，於利舞臺—保良局—一線協助防守³⁰。中午，英軍總司令部下令反攻，英軍不斷從黃泥涌峽道南北兩端投入兵力，嘗試奪回峽道的控制，但均未成功，英軍損失慘重。另一方面，一直於港島西北待命的旁遮普營（2nd Battalion, 14th Punjab Regiment）派出A、D兩連經灣仔向大坑方向前進，嘗試接近北角一帶，以解救司令部認為仍然被困的守軍（其時大多已經投降或潰散）。兩連由旁遮普營營長傑德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Gerald Kidd）率領，但進至大坑後撤退。此後，在大坑的英印軍退至樂活道—藍塘道一帶，與其後增援到附近的旁遮普營B連自禮頓山至藍塘道建立一連串陣地。在灣仔市區，則仍然有包括蘇格蘭營人員、警察，以及防衛軍（主要是負責防空的第5連）人員佈防，前線位於波斯富街—利舞臺—藍塘道³¹。日軍集中在山嶺一帶，未有從市區前進。

12月20至22日間，英日兩軍在黃泥涌峽、淺水灣、紫羅蘭山、大潭等地激戰。日軍自22日起陸續把砲兵從九龍各處調到香港島，特別在寶馬山、渣甸山、赤柱峽等地放列，自東向西向英軍各處陣地射擊。陳君葆在日記中也提到：「冬至。從晨十時半起砲火至晚七時猶未止。最後砲火之烈為前所未見³²。」當晚，日軍佔金馬倫山。禮頓山的英軍亦開始受到壓力。至23日，英皇道的日軍（主要包括步兵第229聯隊第一中隊）開始向銅鑼灣前進，把守軍向灣仔壓迫。稍早前，日軍克服了黃泥涌峽北端的加軍與蘇格蘭營的殘部，因此得以從南到北向跑馬地前進（主要包括步兵第230聯隊人員），席捲禮頓山至藍塘道的防線，使禮頓山的米杜息士營兩面（東、南）受敵。其時，

27 詳見鄺智文（2021）。1941年香港戰役地圖。檢索於2022年2月20日，取自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史庫》：<https://digital.lib.hkbu.edu.hk/1941hkbattle/>

28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二，（香港：商務，2004），頁42。

29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二，頁42-43。

30 當時，香港政府通過《警察（民兵地位）條例》（Police (Militia Status) Ordinance），警察屬於戰鬥人員。CO 129/592/4, TNA, p. 42.

31 詳見鄺智文（2021）。1941年香港戰役地圖。檢索於2022年2月20日，取自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史庫》：<https://digital.lib.hkbu.edu.hk/1941hkbattle/>

32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二，頁43。

禮頓山亦飽受日軍自寶馬山、渣甸山、黃泥涌峽等地的砲火攻擊。在此壓力下，禮頓山的陣地終於在24日下午失守，英軍轉移至摩理臣山繼續抵抗。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稱日軍轟炸禮頓山砲火之猛烈，足以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情況相比³³。

雙方激戰期間，民防受到極大壓力，雖然疏散區、公共飯堂、防空洞，以及救護站仍然運作至守軍投降為止。不少市民在日間要冒生命危險排隊領飯，甚至出現人龍被擊中的情況。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醫生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時，我出任糧食救濟委員，我們鑒於公共食堂欠周，大家商量，將食堂改設於各區之曠地，這樣可容納的較多並可避免房屋受轟炸所遭致死傷。但是，我們的估計卻錯誤了，日本飛機對於曠地上的人，一樣施予殘害，因謀一飽的貧民，受到傷害，死亡的數目，可以百計。³⁴」1957年，工程人員在曾為疏散區的摩理臣山發現裝有人骨容器，時人指出是戰時被炸死者的遺骸³⁵。據一名當時親歷其境的護士回憶，12月20日當日有多人在該地被炸死。警方最後起出32人的遺骨。12月23日，記利佐治街的政府糧倉（帝國化工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的倉庫）被搶掠，警方和守軍曾派員驅趕，但他們已無法控制糧倉³⁶。

雖然灣仔的英軍盡力維持防線，但於25日上午在猛烈砲火下已被迫放棄摩理臣山，退到西面的海軍醫院和灣仔街市一帶。同時，日軍已過銅鑼灣，進至利舞臺。日軍為趕緊結束戰鬥，把工兵亦投入到前線，組成由鈴川清大左率領的鈴川部隊加入到灣仔前線³⁷。至當日下午，英軍的最前線已退到柯布連道，距離海軍船塢只有約800米。此外，日軍亦進至巴里士山下的防空洞，即灣仔街市附近。至下午3時半左右，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建議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投降時，楊慕琦和莫德庇先被帶到灣仔，然後才乘船到半島酒店與日軍司令酒井隆會面³⁸。

英軍投降後，隨即被集中到各主要軍營以及北角的難民營（東旅的部隊被送到此處）等待日軍安排。其時，灣仔—銅鑼灣一帶情況極為混亂，日軍部隊混雜，紀律紊亂，士兵到處搶掠，又強姦婦女，甚至到醫院尋找護士。位於跑馬地的養和醫院首當其衝，院長李樹芬醫生寫道：「養和醫院對面的山光飯店，集合着一批日本兵，我們從醫院中可以望見，他們在大吃大喝，狂歌醉舞……在醉後那些形同禽獸的士兵便四處搶掠、強姦和殺人了。深夜，救命之聲此起彼落，還有人敲擊鐵罐求救……³⁹」。從深水埗戰俘營逃出的防衛軍醫官賴廉士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Lindsay Ride）亦提到日軍在灣仔強姦婦女⁴⁰。家在跑馬地的陳君葆在28日的日記寫道：「傍晚有兵入屋，家人均驚惶不已。阿霞幾乎羅厄，後來我和那二等兵說明她是女僕，同時他又發現我案頭的幾多佛學書，才叫那勤務兵把她釋了。雲湘（其女兒）膽子最小更為震恐，但我可有甚法安慰她⁴¹」。

33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from 8 to 25 December 1941 (Despatch from the Supplement to the London Gazette)," *London Gazette*, 29 January 1948, p. 701.

34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六十年回憶錄》（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9），頁143。

35 "Victims of Raid by Japanese Planes," 6/9/1957, *SCMP*, p. 9.

36 CO 129/592/4, TNA, pp. 47-48.

37 步兵第二二九聯隊史編纂委員會，《步兵第二二九聯隊史》（名古屋：福々會，1981），頁233。

38 "Memorised Despatch from His Excellency. Sir Mark Young, Governor of Hongkong," CO 129/590/25, pp. 3.

39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六十年回憶錄》，頁155-156。

40 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頁41。

41 謝樂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二，頁44。



▲ 戰鬥結束後，市民自防空洞走出，照片應拍攝於港島北（圖片由作者提供）

日據時期的灣仔

日軍攻佔香港後，佔領香港的第23軍先成立「香港軍政廳」（1941年12月28日—1942年2月15日）。可是，東京政府其後成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1942年2月15日—1945年8月30日），該部控制香港至英軍重回香港。早在日軍侵港前，日本海陸軍已簽訂《關於在佔領地實施軍政的海陸軍中央協定》以及《關於香港、九龍政務的海陸軍協定》，為控制香港不同設施和分工作出安排。日軍佔領香港後，陸軍控制港島西區的設施，海軍則大致接收了自海軍船塢到太古的設施，包括海軍船塢和海軍俱樂部（China Fleet Club）一帶。可是，由於爭奪設施和建築物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香港佔領地總督磯谷廉介中將和第2遣支艦隊司令新見政一海軍中將於1942年5月簽訂《關於香港警備和軍政的協定》，再次就設施問題分工。在此協定中，海軍控制了記利佐治街至波斯富街一帶，以及奇力島、銅鑼灣避風塘等地，以建立海軍控制的港務部⁴²。香港是日本海軍「第2遣支艦隊」的司令部，設有「第2工作部」，佔據金鐘舊英國皇家海軍船塢為日軍船隻修理。可是，第2遣支艦隊兵力僅少，日軍亦無力復甦香港的工業，因此香港對日軍而言只是船隻的中轉站。另一方面，盟軍的軍機和潛艇在戰爭期間則不斷干擾日軍在南中國海的日軍海運交通線，打擊了日本和東南亞的聯絡⁴³。

42 鄭智文，《重光之路》，頁246-247。

43 詳見Kwong Chi Man, "The Failure of Japanese Land-Sea Cooper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ong Kong and the South China Coast as an Example, 1942-1945,"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 79, (2015), pp. 523-556.



▲ 一名日軍海軍陸戰隊士兵俯瞰灣仔（圖片由作者提供）

日軍初佔香港時，港島有逾萬日軍，至1月底才陸續撤走，轉移至其他戰場。其後，香港成為日軍在華南地區兵站之一，亦有不少傷兵在港休養。1942年4月，總督部為阻遏軍中性病問題，打算把慰安所集中⁴⁴。據李樹芬醫生回憶，當時日軍軍醫江口豐潔大佐（第23軍軍醫長，香港軍政府和總督部的軍醫部長）於佔領香港後不久即要求把灣仔部份劃為慰安婦集中區，方便管理。和仁廉夫指，具體範圍為軍器廠街東至菲林明道的一段駱克道⁴⁵。英軍情報則提到包括皇家海軍俱樂部等地於佔領初期亦被用作遊樂設施⁴⁶。李樹芬寫道⁴⁷：

灣仔被打扮成一個日本化的市區。這一區域比較新式和考究的樓宇，被用為妓院或酒館餐室。所有這些店鋪及妓院的格局，全採日本式，如用紙窗、松木、燈籠等，還有最矚目的是到處高懸着日本國旗……至於妓女的人數，應該以千數來計算了……他們除了本地招來妓女，並自近鄉及廣州招至，而且也有自日本本土來的妓女。

44 「戰時月報に關する件」，1942年4月，〈昭和17年「陸亞密大日記 第24號 1/3」〉，《陸軍省大日記》，JACAR，Ref: C01000412800，頁13。

45 和仁廉夫（著），張宏艷（譯）《歲月無聲：一個日本人追尋香港日佔史迹》（香港：花千樹，2013），頁89；"Report of Hong Kong by Mr. and Mrs. A. J. Eger," 8/1942, TNA, CO 980/133, p. 2.

46 "Kukong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1," 28/5/1942, ERC, EMR-1B-01,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p. 1.

47 李樹芬，《香港外科醫生：六十年回憶錄》，頁172。

根據香港電話局在1943年出版的《電話番號簿》，日本在灣仔一帶設有海軍四業組合事務所，「四業」即「貨座敷業」、「芸妓置屋」、「料理業」，以及「旅館業」，就是娛樂和飲食、酒店業務。此地可考的主要四業設施都和海軍有關，例如海軍將校俱樂部、海軍下士官兵集會所、海軍第2兵站旅館、海軍第2、3食堂，以及專為海軍士官兵使用的南桃園、吾妻屋、乙姬，以及南海莊等慰安所⁴⁸。

日軍佔領香港後不久，軍政廳在全港各區設立「區政聯絡所」，佔領地總督部沿用區政聯絡所，改稱為「區役所」，並於每區設立「區會」，指派華人領袖為區長和會員以協助地方事務，特別是為居民登記、糧食分發、「歸鄉」（強制把華人趕出香港），以及衛生（主要為接種疫苗）和賑濟等工作。今日的灣仔區大致為四個「區役所」的範圍，即「東區（灣仔，1943年區長為何日洳）」、「春日區（鵝頸橋一帶，1943年區長為何德光）」、「青葉區（跑馬地，1943年區長為吳文澤）」，以及「銅鑼灣區（銅鑼灣，1943年區長為郭顯宏）」⁴⁹。這些區會即使有協助居民的意願，亦由於日軍控制資源，而且只把這些機構視為方便推行其政策（特別是人口、糧食，以及經濟政策）的工具而難以實行⁵⁰。

在日軍統治下，數區的功能有所區分，例如「東區」內有日軍使用的娛樂區以及零售商舖，「春日區」主要是華人聚居地、「青葉區」則有不少日本軍民居住，「銅鑼灣區」則是港島工業區之一，內有日軍建立的機帆船船塢，附近則為北角發電廠和工廠。日本海軍亦佔用東華東院，並把花柳病醫院設於該地⁵¹。1944年開始，總督部兵事部在香港開始訓練日本僑民，快活谷馬場是其中一個訓練場地⁵²。根據英軍服務團1943年3月的情報，在灣仔區的日軍警署和宿舍包括⁵³：

名稱	地點	備註
東區憲兵隊	宏德街4號	隸屬香港憲兵隊
海軍警查派遣隊	舊灣仔二號警署	隸屬海軍
海軍工作部長官宿舍	藍塘道22號	即第二海軍工作部，即使用舊皇家海軍基地的日本海軍工程部隊
海軍工作部部員宿舍	藍塘道11-12、42-44號	同上
福大公司所長宿舍	藍塘道33號	日本軍方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相關公司，在華南活動
福大公司職員宿舍	黃泥涌道99、107號	同上
太古船塢司理宿舍	樂活道5號	由三井造船為日本海軍控制

48 《日本人關係電話番號》（香港：香港電話局，1943），頁8-9。

49 "Table Show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the Japanese Organised Hongkong Government," 1/4/1943, Situation in Enemy Occupied Hong Kong, CO 129/590/22, TNA, unpaginated.

50 有關區役所和區會的角色，詳見鄺智文，《重光之路》，頁97-101。

51 Percy Selwyn-Clarke, *Report on Medic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for the Period 1st January, 1942-31st August, 1945* (London: HMSO, 1946), p. 15.

52 "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78," 22/12/1944, ERC, EMR-1B-05, HKHP, Section 2A, Sheet 23.

53 "Attachment to Waichow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21," 1/3/1943, APR82/068/11/6,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Sheet 1.

一份1944年9月的報告則指灣仔區有以下設施⁵⁴：

名稱	地點	備註
總督部車房	初級工業學校（加路連山道）	有十名日軍和50名華人工人
海軍俱樂部	-	成為軍營，有來自菲律賓的日軍海軍官兵
駱克道一帶	-	仍為日軍慰安區
海軍第一療養院	海軍醫院	-
海軍風紀人員宿舍	灣仔道消防局宿舍	-
保良局	保良局	部份地方被日商行用作貨倉，但仍有200多名孤兒和人員居住



▲ 日本海軍陸戰隊士兵正灣仔在關卡站崗，另有印籍憲查檢查來往市民。哨崗後方的永利隆酒行位於駱克道205號，即菲林明道和駱克道的交界。（圖片由作者提供）

54 "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66," 15/9/1944, ERC, EMR-1B-04, HKHP, Appendix D, Sheet 2-4.

1942年上半年，日軍在亞太地區不斷擴張，香港深入日軍佔領區域，因此軍事活動相對較少。該年下半年開始，盟軍在南太平洋開始反擊，亦從中國對日本佔領區展開空中攻勢。10月，盟軍第一次空襲日佔香港，攻擊九龍船塢和北角發電廠。雖然效果有限，但亦迫使日軍加強香港防空。1944年開始，日本的戰況在明顯轉壞，針對香港的空襲亦愈見猛烈。即使日軍在該年發動一號作戰，並在夏天陸續佔領湖南衡陽的美軍機場，盟軍仍能從廣西、雲南等地派機空襲香港⁵⁵。



▲ 1944年10月16日美軍第14航空隊空襲紅磡期間的灣仔（圖片來源：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灣仔附近的海軍船塢、灣仔對開海面，以及對岸的紅磡亦不時成為目標。這些場面向居民清楚地說明了戰爭的走向。1945年1月15、16兩日，美國海軍第3艦隊空襲香港，多達471架次飛機參與轟炸，主要目標包括維港中的船隻以及兩岸的海港設施。灣仔雖然接近轟炸目標，但區內沒有目標，因此未有嚴重損失。六日後，美國陸軍航空隊屬下的第14航空隊空襲海軍船塢，當日30架B-24轟炸機於下午3時45分左右飛臨港島上空，目標為海軍船塢。由於船塢緊鄰灣仔，部份炸彈擊中灣仔。華文報紙翌日聲稱死傷人數逾1,000人。空襲後，尚在營運的馬島、聖保祿（法國）、養和等醫院有大量傷者求醫，但藥物和人手均不足應付。當時東華東院則被日軍徵用為海軍醫院，因此未有相關資料⁵⁶。其後，商人梁扶初⁵⁷發起募捐，籌得軍票80萬圓及米一萬斤予受難的灣仔居民。戰爭期間，部份投擲在灣仔對開海面的炸彈未有爆炸，數十年後才被發現。

55 有關轟炸香港，詳見Carroll Glines, *Chennault's Forgotten Warriors: the Saga of the 308th Bomb Group in China* (Atglen: Schiffer Publishing, 1995).

56 「昨日下午三時許 敵機廿餘架襲港」，《華僑日報》，1945年1月22日，頁2；「東部華人商業住宅區 空襲災情續詳」，《華僑日報》，1945年1月23日，頁2；「各界捐救空襲巨災 一日間逾八十萬」，《華僑日報》，1945年1月24日，頁2。

57 梁扶初早年於日本組織棒球隊，戰時在香港。

1945年4月4日，美軍遠東航空軍 (Far East Air Force) 空襲銅鑼灣和海軍船塢⁵⁸。由於日軍大型船隻損失慘重，而且容易成為盟軍潛艇和飛機的目標，因此日軍在香港各地建造大量木製機帆船，以維持華南地區的海運需要。當時，銅鑼灣避風塘是日軍興建機帆船的區域之一，設有敬記 (Ah King's)、同泰 (Tung Tai)、以及錦記 (Kum Kee) 三間船廠，其中美軍情報指單是敬記即有六個船台，1944年預計可以生產共5,400噸機帆船⁵⁹。當日清晨，首批轟炸機空襲避風塘，華文報紙稱已造成過百人傷亡，傷者被送到就近的法國醫院。上午11時至下午2時，數十架B-24再次轟炸此地區，結果有炸彈擊中位於今日聖保祿醫院位置的聖保祿育嬰堂。炸彈炸死了四名修女和數十名兒童，另有逾百名修女和兒童受傷。當日灣仔區亦有多人傷亡。空襲後，銅鑼灣區區役所和香港災區救濟委員會曾派員協助⁶⁰。自此以後，雖然盟軍仍對香港發動了數次空襲，但灣仔未再成為目標。

結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灣仔區造成重大破壞。1946年，建築物重建諮詢委員會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Advisory Committee) 點算香港損毀建築物，總結全港共有20,506座建築物損毀，其中9,360棟全毀。在這些數字中，唐樓佔大多數，共有8,217棟全毀，8,039棟受損。委員會把損毀分為五級⁶¹：

- A.** 可以即時居住，只需要清潔和修理門窗。
- B.** 有天花和門窗，水泥和木地台完整
- C.** 有天花但失去大部份木製部份，例如門窗、樓梯、地台，失去衛生設備和電燈
- D.** 天花受損或全毀，但可以在大規模修復後居住
- E.** (幾乎) 全毀，或12個月內不能修復

58 Kit C. Carter and Robert Mueller, *U.S.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Combat Chronology, 1941-1945*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ir Force History, 1991), p. 666; Wesley Frank Craven and James Lea Cate (eds.),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 5: the Pacific: Matterhorn to Nagasaki*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1983), p. 502.

59 "Japanese Wooden Ships," 15/7/1944, National Archive, NND750140, p. 18.

60 「敵機昨日對市街投彈 炸燬法國醫院及聖堂」，《華僑日報》，1945年4月5日，頁2。

61 "Building Reconstruction Advisory Committee Final Report," 9/4/1946 (Hong Kong: Ye Olde Printeries, 1946), CO 129/595/6, TNA, p. 13.

其中，灣仔和銅鑼灣區佔全港損毀唐樓的約百分之28，數字如下⁶²：

受損情況	灣仔	銅鑼灣	大坑
A級	95	--	
B級	236	26	-
C級	619	153	6
D級	1,071	52	-
E級	1,148	46	29
總數	2,021	277	35

至於戰爭期間灣仔區居民，面對軍票、糧食配給，以及強制逼遷等政策而流離失所，傷亡人數則難以估計⁶³。

綜上述，灣仔區由於鄰近中區的軍事要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大破壞。戰前，香港政府和守軍於1939至1940年開始準備可能出現的入侵，但政府高層對應否於開戰期間守住香港表示懷疑，而且由於資源緊拙等問題，民防工作進展緩慢。直到1940年陸軍中將岳桐到港後，民防工作得到加強，特別是市區的防空工事。1941年12月香港戰役期間，灣仔區成為最前線，並被日軍砲轟多日，不但破壞大量建築，市民傷亡亦難以估計。在日據時期，灣仔、銅鑼灣，以及跑馬地成為日本海軍的活動範圍，並位於盟軍主要攻擊目標附近。在1944至1945年，由於日本戰局惡化，灣仔附近亦遭到大規模空襲，部份炸彈更擊中灣仔的房屋和醫院，造成不少市民傷亡。與其他地區相比，戰爭對灣仔造成的破壞更大。幸好由於香港戰後局勢相對平穩，因此重建過程亦頗為順利。



62 Ibid., p. 16.

63 有關港人在日據時期之苦難，詳見《重光之路》、Philip Cracknell, *Th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1941-45* (Stroud: Amberley Publishing, 2022).

灣仔街道

與

香港政商名人

黃競聰

前言

街道命名向來與政治、經濟和社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香港不少街道的名稱以人名命名，他們大都具有顯赫的身份，要不是在香港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灣仔是香港早期發展地區，區內保留了很多珍貴的文化遺產，部份街道超過百年歷史，更有不少街道以香港政商名人而命名。是次文章，探討香港街名管理工作之演變，並介紹灣仔街道的政商名人，以及其與香港發展的關係。

香港街道命名管理工作

二次大戰前，工務局統籌香港街道命名的工作，一般的程序是把建議的街名呈交輔政司，接着輔政司諮詢相關官員，收集意見，最後遞交港督審批。如果沒有問題，便可以交給地政部、驛務司和總巡捕執行。二十世紀初，工務局發現有不少九龍街名和香港島相同，其中尖沙咀尤為嚴重。要知道相同街道名稱很容易引起道路使用者無所適從，遂成立小組，處理街名混亂的狀況，重新命名有問題的街道。如位於灣仔區愛賓利街（Albany Street）改為太原街（Tai Yuan Street），以別中環雅賓利道（Albany Road）¹。

STREETS IN HONGKONG.			
Old Names.		New Names.	
Chater Street	Catchick Street	吉席街
Albany Street	Tai Yuan Street	太原街
East Street	Tung Street	大東街
West Street	Sai Street	西街

STREETS IN KOWLOON.			
Old Names.		New Names.	
Chater Street	Peking Road	北京道
Des Vaux Road	Chatham Road	漆咸道
Garden Road	Hankow Road	漢口道
Robinson Road	Nathan Road	彌敦道
Macdonnell Road	Canton Road	廣東道
Elgin Road	Haiphong Road	海防道
East Road	Hanoi Road	河內道
East Avenue	Sainam Avenue	西貢道
East Terrace	Wuchow Terrace	梧州台

STREETS IN YAUMATEI.			
Old Names.		New Names.	
First Street	Kauw Street	甘肅街
Second Street	Fakhoi Street	北海街
Third Street	Saigon Street	西貢街
Fourth Street	Ningpo Street	寧波街

▲ 1909年政府刊憲將部分港九街道易名，避免引起混（圖片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

¹ 尖沙咀德輔道改為漆咸道、遮打道改為北京道、麥當奴道改為廣東道、羅便臣道改彌敦道。

二次大戰後，香港街道命名逐漸受到規範，市區街道命名的工作由市政局主席負責，新界地區則由新界民政專員統籌²。

自從一九五四以來，市政局一直為這些街道命名。不過街道命名的工作並非完全由市政局單獨負責，我們扮演統籌的角色，負責跟各有關部門進行密切聯絡。舉例來說，一條新道路建成後，路政署會通知市政局，隨即開展街道命名的工作。政務總署的港九政務署長，諮詢有關地區的街坊或團體，收集意見，便建議街道的名稱。公共屋邨內的街道則由房屋署署長建議名稱。至於私人土地的街道亦會先諮詢業主的意見。與此同時，當局會徵收中文專員、差餉物業估價署長、郵政署長、註冊總署長及路政署署長的意見，避免跟新界街道的名稱相同。建議的名稱會呈交市政局決定，隨後刊憲公布³。

1955年，華民政務司署發表報告，指出當時街道命名沒有統一標準，任意命名，建議用街、道、里、台和圍五款。此後，市政局成立「遴選街名委員會」負責街道命名工作，1963年進一步制定指引，更嚴格規範街道命名的形式。如街道名稱以中文為主，輔以英文譯名，中文須簡單淺白。1966年，遴選街名委員會易名為「公園、文娛和優閒設施委員會」。1974年，新界民政司替代新界民政專員，改由首席土地助理負責命名工作，並按市區街道命名指引外，附加一些鄉村條文⁴。

1980年，香港政府刊憲《公眾衛生及市政事務（修訂）（第二號）條例》，賦予市政局及新界政務司有法定權，管制市區及新界之街道命名，目的是防止私人街道採用當局不恰當的名稱。條例准許私人街道之土地持有人，擁有街道建議命名權或更改權，但是仍須經過當局審批⁵。1988年，地政總署取代了區域市政總署，負責新界的街道命名工作⁶。1999年，市政局解散，地政總署署長獲授權為香港的街道命名⁷。

2 馬冠堯：《香港工程考II：三十一條以工程師命名的街道》，（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頁14-16。

3 華僑日報，1989年8月7日，〈街道命名 市口□□ 鮮為人知〉。

4 馬冠堯：《香港工程考II：三十一條以工程師命名的街道》，（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

5 當局有權力否決業主的建議，並容許可向港督會同行政局提出上訴。法案更賦予政府權力命名未有街名的街道，或更改街道的名稱。若更改街道的名稱須在刊憲前30天，發出公告，有關人士可以提出反對。政府重新考慮後，將最終的決定通知反對者。如不服判決者，可以再向港督會同行政局提出上訴。詳見華僑日報，1980年6月14日，〈市局及新界司賦予權力 管制街道命名〉。

6 沙田區議會發展及房屋委員會會議記錄，2019年5月2日。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t/doc/2016_2019/sc/committee_meetings_doc/DHC/15566/st_dhc_2019_017_tc.pdf

7 新聞公告，2015年12月9日，〈立法會十五題：地方命名〉。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2/09/P201512090400.htm>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鄰近街道命名爭議

上世紀八十年代，位於灣仔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落成，整個計劃由貿易發展局統籌。為了興建這座會議中心，灣仔進行填海工程，並修建新的道路。貿易發展局建議將展覽中心以南的港灣道，改名為展望大道，展覽中心以北的道路命名為會議路，新建行人天橋則建議命名展覽橋、會議里、博覽橋、國際橋等。然而，此舉卻引來政府不同部門反對，連帶鄰近的商業大廈的業主也不贊成。

這些政府部門包括有地政署（香港西）、路政署總工程師（香港區）、中文專員、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屋宇地政註冊署署長、灣仔政務專員、藝術中心、瑞安集團、灣仔東西分區委員會及區內一些公司⁸。

政府各部門和當區業主反對理由不一，註冊總署署長認為無必要重新命名街道，以突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位置。瑞安集團反對重新命名港灣道，此舉將會導致「現有機構帶來不便及額外開支」。不過，大多數的反對者明顯針對並非街道命名的問題，而是不贊成街名由貿易發展局提出，認為此例一開後患無窮。

灣仔街道與香港政治名人

香港街道命名往往受當時政府管治意識形態的主導，反映出香港的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香港開埠初期，不少港九街道均選用英國皇室成員、當地殖民地總督和高級官員姓名，無疑是彰顯殖民地主權的手法，亦是英國殖民地管治慣用的策略。灣仔是早期開發的社區，自然有街道以港督姓名來命名，如第八任港督命名的軒尼詩道；亦有以本港高級官員姓名命名的街道，如以輔政司馬師姓名命名的馬師道，甚至用英國皇室成員命名的告士打道等。

值得注意的是，街名與當區發展未必存在直接關係，除了體現主權之外，更多是出於感謝官員對香港有所貢獻。然而，有不少高級官員在任期間，對當區進行開發，或因應社會的需要，開築道路，竣工便以其名字命名，如堅尼地城和堅尼地道。二次大戰以後，香港政府調整治港策略，連帶街道命名亦逐漸棄用殖民地官員命名街道的傳統。君不見戰後的港督名字大多出現於公共建築和康體設施，如以第二十六任港督名字命名的衛奕信徑，藉此突出殖民地官員與香港社會民生連在一起，減低市民大眾對殖民地管治的抗拒感。

⁸ 華僑日報，1987年9月6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明年落成 鄰近街道命名 受到各方反對〉。

列表一：部份以政治人物命名的灣仔街道

灣仔街道	政治人物	職銜
堅尼地道 Kennedy Road	堅尼地 Sir Arthur Edward Kennedy	第七任港督
軒尼詩道 Hennessy Road	軒尼詩 Sir John Pope Hennessy	第八任港督
寶雲道 Bowen Road	寶雲 Sir George Ferguson Bowen	第九任港督
莊士敦道 Johnston Road	莊士敦 A. E. Johnston	副商務總監
杜老誌道 Tonnochy Road	杜老誌 Malcolm Struan Tonnochy	輔政司
馬師道 Marsh Road	馬師 Sir William Henry Marsh	輔政司
史釗域道 Stewart Road	史釗域 Frederick Stewart	輔政司
菲林明道 Fleming Road	菲林明 Sir Francis Fleming	布政司
柯布連道 O'Brien Road	柯布連 Sir George Thomas Michael O'Brien	布政司
駱克道 Lockhart Road	駱克 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布政司
譚臣道 Thomson Road	譚臣 Alexander Macdonald Thomson	布政司
盧押道 Luard Road	盧押 Charles Camac Luard	軍事指揮官
告士打道 Gloucester Road	告士打 H.R.H. Prince Henry, Duke of Gloucester	英皇佐治五世第三子 告羅士打公爵

以下選取了兩條以香港政治名人命名的灣仔街道，加以詳述：

一. 堅尼地道 (Kennedy Road)

老一輩香港人稱皇后大道為大馬路，堅尼地道為二馬路，寶雲道為三馬路。堅尼地 (Sir Arthur Edward Kennedy) 是第七任港督，他出生於愛爾蘭，堅尼地長期在英軍服役，後棄武從文，轉到殖民地部工作，更曾擔任非洲贊比亞總督。1872年，堅尼地年屆六十三歲，接替麥當奴 (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ald)⁹。1874年，一場開埠以來最強烈的颶風吹襲香港，由於當時天文台尚未成立，香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迎接」這個風災，死亡人數4000至5000人，沉船185艘，外洋輪船35艘，損傷船隻455艘，損失財物500萬元。當時，新落成的聖約瑟堂被摧毀，筲箕灣和油麻地天后廟被吹塌，興建不夠十年的昂船洲監獄全毀，史稱「甲戌風災」¹⁰。1880年昂船洲發現遺骸百餘具，東華醫院當屆主席招雨田及總理聘請工人，撿拾骸骨，港督軒尼詩捐出薪俸，並於香港島雞籠環墳場建成義塚，定名為遭風義塚。1959年墳場停用後，義塚被遷至粉嶺和合石墳場¹¹。

香港島華人人口不斷增加，礙於中環臨海地段的外商的反對，自1850年代後期港英政府積極開發西區的土地，先後將西營盤和石塘咀納入維多利亞城的範圍。堅尼地為了進一步滿足新來港的華人對土地的需求，於是開發港島西端的地區，積極填海造地，耗費591英鎊於垃圾灣 (Lap Sap Wan) 填海¹²。工程伸延至今卑路乍街以北，即後來之堅尼地城¹³。港英政府原本構思開發堅尼地城得出來的土地，企圖改善維多利亞城已見擠迫的環境，然而卻沒有考慮到堅尼地城交通不便，發展不如理想，未能達致預期的效果。開埠初期，軍方勢力強大，港島不少地區劃為軍事用地，當中包括中環與灣仔之間地帶即今稱金鐘，劃為軍事用地，因此兩地之間的交通無形中受軍營阻隔。堅尼地曾建議於軍事地帶開闢臨海道路，解決交通問題，但遭受海軍反對，只好改在半山開闢堅尼地道，於1876年通車，卻始終未能成功舒緩金鐘交通擠塞問題。直到1950年末，軍部交出海軍船塢大部份土地，金鐘交通樽頸才真正得到解決¹⁴。

9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1月第一版第三次印刷)，頁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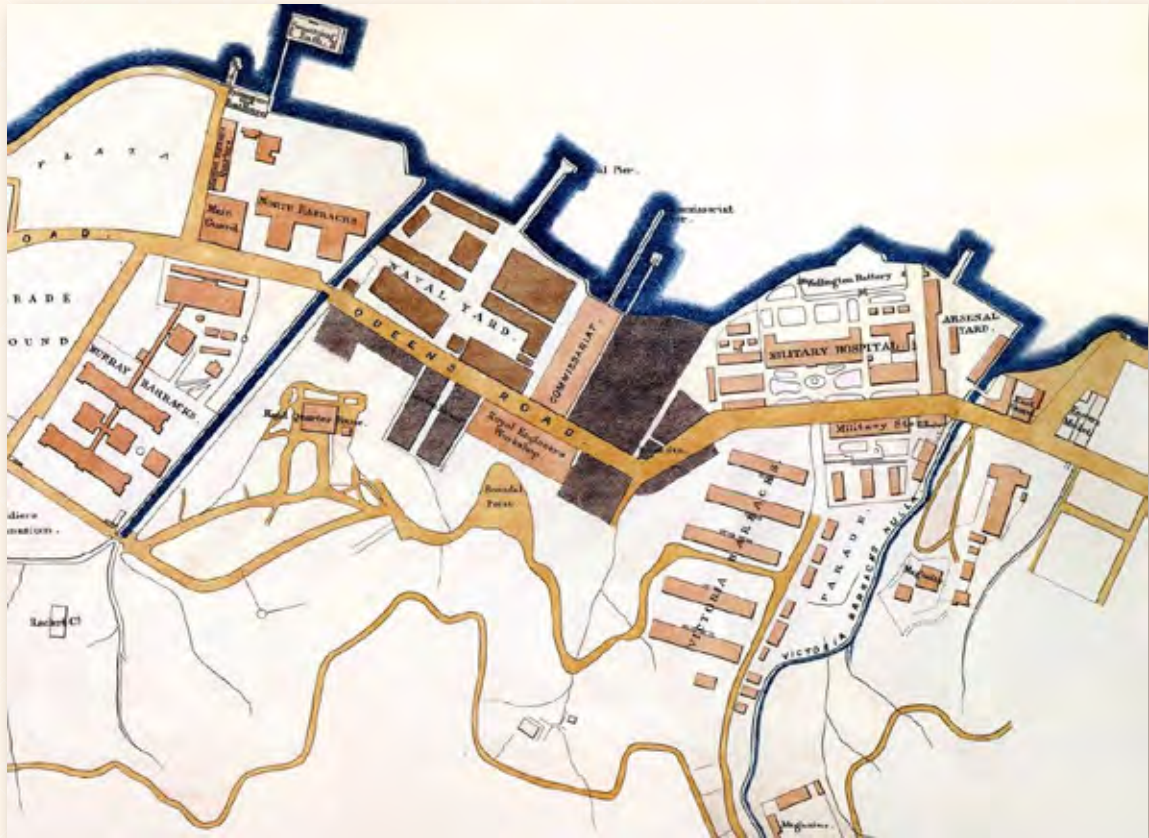
10 拙作：《香港島西營盤區之發展－從軍營到市鎮(1841-1903)》，(香港：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系碩士論文，未刊)。

11 東華三院編：《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香港：東華三院，1970年)，頁179。

12 這地區未發展之時，曾有一條小村，名為大石下，村民以務農和打石為業。隨着港島西部的開發至西營盤，大石下早已成為荒村，由於位處偏僻，作為傾倒垃圾的地方，故稱為垃圾灣。詳見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頁58-59。

13 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4)，頁71。

14 何佩然：《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頁154-155。



▲ 1880年中環及金鐘一帶地圖，軍營及軍方設施佔據了主要土地，難以開闢新道路（圖片由高添強先生提供）



◀ 香港的第七任港督堅尼地（圖片來源：Royal Collection Trust / © His Majesty King Charles III 2023）

二. 駱克道 (Lockhart Road)

駱克 (J. H. Stewart Lockhart) 出生於蘇格蘭，畢業於愛丁堡大學，加入英國殖民地部，曾前往廣州學習中文，並以駱任廷作為自己的中文名字¹⁵。1887年，駱克出任華民政務司，經常與香港華人有緊密接觸，建立了良好關係。十九世紀末，香港經常發生誘拐婦孺、逼良為娼、販賣人口的案件¹⁶。1878年，香港商紳上書港督軒尼詩 (Sir John Pope Hennessy)，申請成立保良公局，1882年英國理藩院通過《保良局條例》。保良局的「保良」二字，取其保赤安良之意¹⁷。保良局創辦初期，經費不足，獲東華醫院借出平安樓和福壽樓，作為辦事及收容婦孺的地方。後因收容日眾，地方不敷應用，加上東華與保良局共用福壽樓，局中婦孺和東華醫院病人共用一處，殊感不便，且因聲浪問題容易發生磨擦¹⁸。

有見及此，1891年東華借出廣福義祠第三百六十一號地段，再加上保良局購入第一千三百五十六號地段，籌建第二代局址¹⁹。1892年時任華民政務司駱克協助保良局，撰寫報告書，向當局反映情況，因而批出更多經費²⁰。1894年，定例局修訂《保良局組織條例》，駱克擔任保良局董事局主席。1896年11月13日第二代局址正式啟用，港督羅便臣爵士 (Sir William Robinson) 主持啟鑰儀式。今廣福義祠門前左下方有碑石，記載此事：

本廟地段乃因眾議，借建保良公局，以為辦善之用。今移在廟右建後蒙
輔政使司兼華民政務司駱大人親臨立石，以垂永久，敬泐數語，用誌弗諼。

1895年，駱克身兼輔政司與華民政務司，地位僅次於香港總督。1898年6月9日，中英簽訂《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99年，規定於同年7月1日生效²¹。1898年6月9日簽訂《專條》，規定於同年7月1日生效。1898年8月2日，休假中的駱克抵達香港，瞬即帶領一班調查隊員前往新界，8月底調查完畢，並在同年10月8日呈交《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給英國政府。這份長達31頁的《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Report by Mr. Steward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以下簡稱：《報告書》)，細列出新界的人口、經濟結構、村落和風俗習慣等，並對日後管治新界提出意見²²。

16 1878年，香港紳商上書第八任港督軒尼詩 (Sir John Pope Hennessy)，請准集資懸賞，查辦拐帶案件，遂成立保良公局。保良局的「保良」二字，取其保赤安良之意。1880年5月，港英政府首次委託保良局調查拐帶案件。詳見保良局董事局編：《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1978》，(香港：保良局，1978)，頁211。

17 保良局初期工作，專責防止誘拐，保護、照顧查獲的婦孺，並協助調解家庭與婚姻糾紛，為她們提供容身之所。"Rules for the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No. 318 of 1882, 5 August 1882,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hereafter HKGG)*, 5 August, 1882.

18 梁惠娟：〈保良局的成立及十九世紀末的發展〉，載入蕭國健、游子安編：《1894-1920年代歷史鉅變中的香港》，(香港：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薈色園，2016年5月初版)，頁401-413。

19 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頁93。

20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編輯小組委員會：《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香港保良局，1966)，頁48-50。

21 1898年英國援引「片面最惠國待遇」，以及防範法國為由，提出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租借新界。

22 英國殖民地部大臣張伯倫稱讚《報告書》，對英方日後制定管治新界的方針有巨大的貢獻，肯定其在歷史的地位。詳見劉存寬：〈評駱克《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載《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頁92-100。

新界租借以後，香港政府任命駱克出任新界行政專員，身兼華民政務司。1902年，駱克調任山東威海衛文職行政長官，香港華人領袖特別在大會堂舉行歡送晚會。1920年，威海衛發生旱災，糧食短缺，受災人數估計多達十萬人，當地政府和商人組成「威海衛賑濟會」，駱克擔任正會長。他運用過去在港建立的人脈，積極聯繫香港華人團體募捐，成功籌得善款六萬五千七百三十港元。駱克為答謝香港華商慷慨解囊，表揚他們的善舉，分別贈送了「可以療飢」題字給東華醫院，以及「舊雨慈雲」題字贈予華商總會²³。

1921年，香港政府通過第17號《海旁東部填海法案》(Praya East Reclamation Ordinance No.17)，填海範圍由軍器廠街至銅鑼灣東角，動工歷時近八年，耗資二百七十多萬港元，填海所使用的泥土是由從剷平摩理臣山得來，新填土地多達一百英畝²⁴。1929年，香港輔政司修頓致函駱克，灣仔填海新增的路段，將以他的名字命名新街道²⁵。



◀ 駱克曾任香港輔政司與華民政務司（圖片來源：The Stewart Lockhart Collection, George Watson's College / The Scottish National Photography Collection）

23 香港歷史博物館編：《甲午戰後：租借新界及威海衛》，（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14），頁140-141。

24 拙作：《香港島西營盤區之發展－從軍營到市鎮（1841-1903）》，（香港：香港珠海院學中國歷史系碩士論文，未刊）。

25 香港歷史博物館編：《甲午戰後：租借新界及威海衛》，（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14），頁40。



▲ 1920年駱克送贈東華醫院的「可以療飢」匾額，答謝該院對山東威海衛受旱災影響的災民慷慨解囊（圖片由東華三院文物館提供）

灣仔與香港商人命名或有關的街道

1841年前，灣仔一帶臨近海岸，背靠石山，平地稀少，故人跡罕至。英軍佔領港島後，同年6月進行土地拍賣，英商顛地投得今石水渠街一帶的土地，開發成為寶順洋行 (Dent's and Co.) 的根據地。早期來港人士多是單身男性，只為尋找工作機會。直到十九世紀末，華商看準香港經濟前景，進行大量土地投資，地產發展商亦有權命名街道。觀乎灣仔街道有的以商號或商人姓名而命名，反映出華商的經濟實力逐漸與洋商分庭抗禮。是故，灣仔既有洋行商號命名的街道，如克街和機利臣街；亦有以華商開辦的商號命名的街道，如聯發街和利東街。二次大戰後，街名管理的工作更趨專業化，進一步規範街道命名的原則，如街名一律不採用在世人士名稱，避免日後出現尷尬的情況。自此，以人名命名的街道逐漸減少，反過來街名變得更「貼地」，大多因應當區的經濟民生概況而命名，如位處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附近的街道，稱為博覽道。

列表二：部份以商人命名的灣仔街道

街道	商人姓名 / 商號
春園街 Spring Garden Lane	顛地 (William Den)
蘭杜街 Landale Street	蘭杜 (David Landale)
機利臣街 Gilman Street	機利臣洋行 (Gilman & Co.)
克街 Heard Street	瓊記洋行 (Augustine Heard & Co.)
聯發街 Lun Fat Street	林護家族
肇堅里 Shiu Kin Lane	鄧肇堅爵士
利東街 Lee Tung Street	利氏家族
李節街 Li Chit Street	李節

以下選取了兩條以香港政治名人命名的灣仔街道，加以詳述：

一．肇堅里（Shiu Kin Lane）

鄧志昂是廣東南海人，創辦「鄧天福銀號」。1905年，鄧志昂出任東華醫院主席，大力推動東華醫院贈醫施藥的工作。1907至1910年期間，鄧志昂擔任廣華醫院總理。鄧志昂捐建香港大學中國語文及文學科目的教學樓，並以其名字命名為鄧志昂樓。其子鄧肇堅生於1901年，歷任九巴、恒生銀行、油麻地小輪、香港商業電台和美麗華酒店等董事。鄧肇堅繼承了其父樂善好施的優良傳統，一生致力公益慈善事業，成就超卓²⁶。灣仔街坊都清楚靠近愛群道一帶有醫院以鄧肇堅父子而命名，分別是鄧肇堅醫院和鄧志昂專科診療院。鄧肇堅有感當時港島只有一間公營醫院，不足以應付現實需要，復以東區病人前往瑪利醫院，長途跋涉，殊感不便，遂建議政府興建新醫院。香港政府撥出灣仔地段，鄧肇堅捐出部份興建工程費用，並命名為鄧肇堅醫院。

不過，很少人知道鄧肇堅醫院旁有一條街道是用鄧肇堅的名字命名，這就是肇堅里，從皇后大道東穿過肇堅里，便可以直達愛群道。有趣的是，愛群道有兩間中學均以鄧肇堅命名，一間是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另一間是聖公會鄧肇堅中學。前者創立1933年，最初是初級工業學校，附設於前維多利亞英童學校，後又附設於前活道工業學院。1950年，該校與摩理臣山小學共用校舍，1957年易名為維多利亞工業學校，並遷回活道舊校址。直到1979年，鄧肇堅慷慨捐款建新校舍，為表揚其樂善好施，重新命名為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²⁷。又聖公會鄧肇堅中學原名為聖公會中學，創辦於1962年，初期借用聖保羅男女學校校舍，後遷至聖瑪利亞堂中學²⁸。鄧肇堅捐出鉅款，興建新校舍，記以勒石，交代該校與鄧肇堅之因緣。

鄧肇堅爵士又復捐出巨資，為香港教育及醫療慈善事業之用，指定其中伍拾萬圓，為聖公會發展教育經費，足見仁者存心，旨在博愛，凡義所當為者，未嘗以方隅為限。此固本會之榮，抑亦士林之幸也。今全部校舍已慶落成，啟用有日，同人等緬懷高義，感泐弗忘。當經詢謀，僉同以斯校命名為聖公會鄧肇堅中學，並顏其禮堂曰肇堅堂，以彰盛德。庶期樹之風聲，永垂典則。至於爵士之善言善行，久已著於當世，無待吾人喋喋。今所述錄者，殆其興培材之一斑焉已²⁹。

26 譚仲夏：《鄧肇堅的一生》，（香港：香港新聞出版社，1986年6月初版），頁12-18。

27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編：《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七十周年校慶紀念特刊》，（香港：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2003），頁48。

28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編：《聖公會鄧肇堅中學二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鄧肇堅中學，1982），無頁碼。

29 鄧肇堅爵士捐贈聖公會教育經費紀略，主曆一千九百七十年三月五日。

1924年，鄧肇堅年僅廿餘歲便擔任東華醫院總理，1928年他更出任東華醫院主席，任內負責策劃東華東院。1932年，保良局總部搬遷禮頓道新址，鄧肇堅被選任保良局主席。為了表揚他的善舉，他先後獲英國政府頒授勳銜，包括有M.B.E、O.B.E和C.B.E，1964年獲英女皇封賜爵士頭銜。



▲ 1928年東華東院奠基禮合照，鄧肇堅（紅圈者）為當屆東華醫院主席，時年27歲（圖片由東華三院文物館提供）



▲ 位於鄧肇堅醫院則的肇堅里（圖片由作者提供）

二. 李節街 (Li Chit Street)

李節字象蓮，別號鏡泉，與李陞昆仲創辦禮興號，經營金山莊生意³⁰，他更在三藩市創立禮興隆³¹。一直以來，每當研究香港開埠後的歷史，例必提及李陞這位於1881年曾經是全港納稅最高的富商，作為香港華人躍起的標誌。李陞字象薰，別號玉衡，生於道光十年（1830），廣東新會七堡人。1864年，李良去世，其財產暫由李陞保管，頓成族中領袖。李陞大規模進軍本地房地產市場，參與政府填海工程，積極涉足不同行業，不斷累積財產³²。1869年金山莊同業推舉和興金山莊作為行業代表，連續三年獲任東華醫院首總理。李陞堪稱十九世紀末的香港首富，業務遍及內地與香港。1900年李陞去世，遺產高達600萬元，同年比當年香港稅收還多180萬元。李陞有八個兒子，二子寶倫、四子寶龍和七子寶鴻先後擔任東華總理，其中李寶龍八子兆忠在遺產中捐出一億五千萬元給東華三院³³。

李節熱衷投資地產，在中環一帶永安街、永吉街、永和街和永勝街等興建樓房，又在西環興建和珍醬園³⁴。1896年，李節去世，遺體運返廣州落葬，由兄長李陞和長子鴻年擔任遺囑執行人。除此以外，他亦精通各樣的投資，從他的遺囑臚列出來的物業和股份可見一斑，包括有當舖店、米舖、醬園、水泥廠等，持有土地不局限於香港，散佈於廣州、澳門和佛山等。李節同樣有八個兒子，二子葆葵和六子亦梅尤為出眾，均有卓越成就。李葆葵字賢學，別號鴻翔，生於1872年。他繼承父業廣隆泰，後創辦寶興泰。他看準商機，成立寶順及益泰輪船公司，更參與創辦廣東銀行。此外，他熱心公益事業，有份參與創辦華人永遠墳場，並先後擔任東華醫院總理（1904/1905）和香港保良局永遠顧問（1915）³⁵。1921年，李葆葵長子韶清亦擔任東華醫院總理³⁶。

李亦梅是李節的第六子，諱鴻材，與東華醫院的發展擔演着重要角色。1921年，李亦梅擔任東華醫院主席，集善醫院建議交由東華醫院接管，並答應將來的營運開支，仍由東區街坊籌募經費。董事局幾經研究原則上同意接辦集善醫院，但董事局換屆在即，於是把最終決定權留待下屆總理處理。1925年，東華正式接收集善醫院，有感原來局址地方有限，未能配合當區的需要。翌年，香港政府撥出掃桿埔一地，作為東華東院的局址³⁷。李節長子鴻年第三子李海東，號錫澂，字希泌，熱愛弘揚傳統文化，有份創辦學海書樓³⁸。1927年，李海東擔任東華醫院主席，成立籌款部，籌建東華東院³⁹。1929年落成，1931年東華東院完成合併。由此可見，李陞家族三代成員屢次擔任東華主席和總理，淵源甚深，無庸置疑對東華有着重大貢獻。

30 經營海外華僑代辦各項土產的「辦莊」，大部份以運往舊金山為多，故稱之為金山莊。

31 《李氏安居堂家譜》，頁26。

32 除了投放資金建碼頭和設倉庫外，還開發了李陞街、高陞街、和興東街、和興西街、松秀東街和松秀西街，通過房地產賺取巨額利潤。和興西街現稱皇后街。

33 丁新豹：《十九世紀香港首富：李陞家族初探》，載入鄭宏泰、周文港：《東南西北四方：文咸街里》，（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頁223-224。

34 《李氏安居堂家譜》，頁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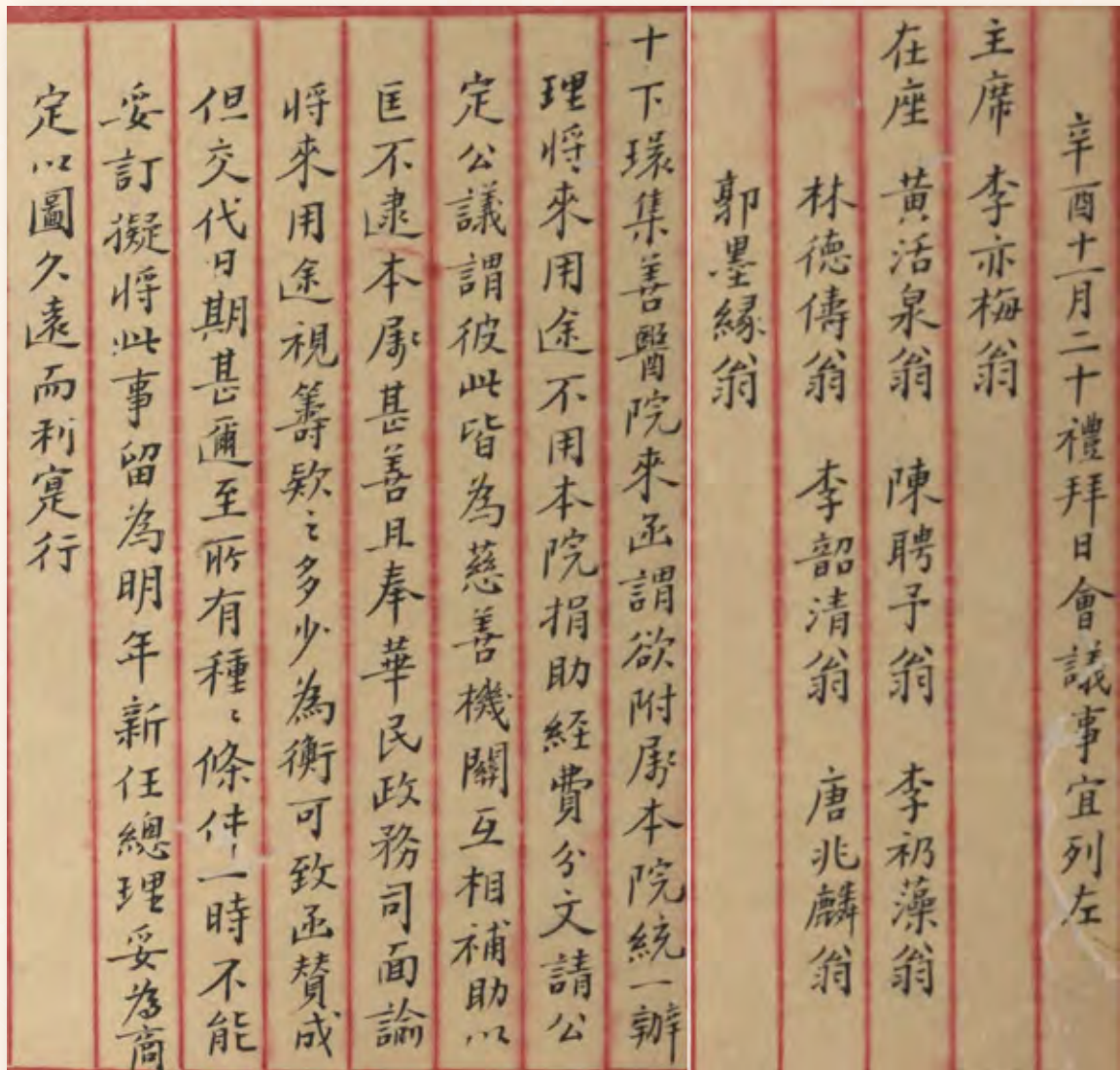
35 《李氏安居堂家譜》，頁28-30。

36 統一前東華醫院及廣華醫院歷屆董事局成員：<https://www.tungwah.org.hk/about/corporate-governance/board-of-directors/past-board/>

37 東華三院編：《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香港：東華三院，1970年），頁123-126。

38 《李氏安居堂家譜》，頁36。

39 《李氏安居堂家譜》，頁35。



▲《東華醫院董事局會議紀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時任主席是李亦梅，當時董事局換屆在即，決定將接管集善醫院一事，留待下屆總理處理（圖片來源：東華三院文物館）

1920年4月1日，香港政府正式命名此街道為李節街⁴⁰。1991年2月7日，李節街十七座戰前樓宇被列為危樓，同年4月全部住戶遷出。土地發展公司承辦此項重建計劃，其中部份路段劃為私家路，部份土地改建成了一個「有園景美化的休憩地方」，名為李節花日園⁴¹。最特別的是，該公園闢有一處，展示一比一的仿真唐樓前壁，可謂香港回歸前「保育神作」。

40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 April, 1920, P.147.

41 《大公報》，1991年12月22日，《李節街局部封閉 建社區設施住宅》。



▲ 李節花園的仿真唐樓前壁（圖片由作者提供）

結論

街道命名從來不是約定俗成，而是政治部門的工作之一，更是統治者彰顯權力的地方。二次大戰前，統籌街道命的工作是由工務局負責，直到1960年代，香港政府成立「遴選街名委員會」制定指引，確立了市政局和新界政務司有命名街道的法定權力。時至今天，地政總署署長獲授權為香港的街道命名。是次文章，礙於篇幅所限，未能逐一細及每條灣仔政商名人街道的故事，只選取介紹了較為人忽略的灣仔政商名人街道，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發讀者細心留意身邊街道故事。無可否認，有不少灣仔政治名人的街道對當區發展沒有直接關係，可以肯定的是，大部份的卻對香港發展有着重大的貢獻。



摩利臣山

沒有山

劉國偉



前言

摩利臣山曾經只是灣仔的一座小山。香港開埠初期，馬禮遜學校及傳道會醫院曾聳立其上。1920年代，從摩利臣山開採之山石曾用於海旁東的填海工程。戰後，港府繼續委託承建商從摩利臣山開採山石，至1960年代打後，山上陸續有學校、醫院、泳池等建成。本文將會簡單介紹摩利臣山百多年的發展故事。

馬禮遜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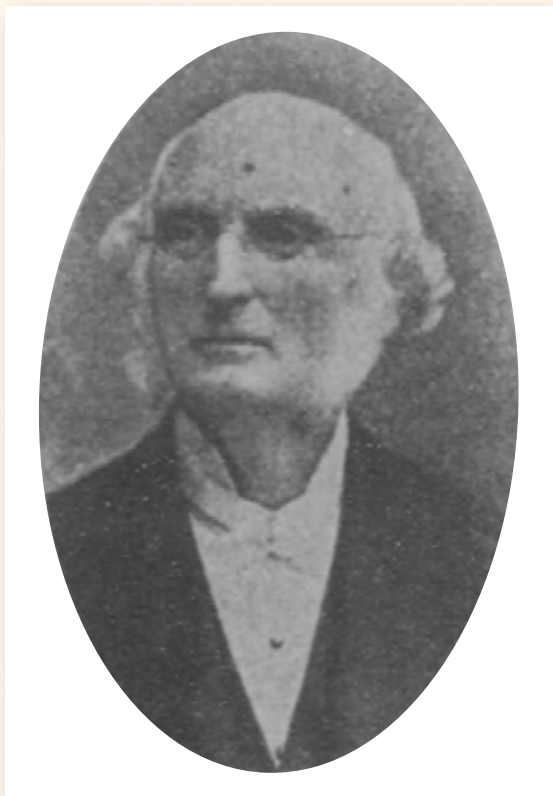
摩利臣山最早之發展，必須從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說起。馬禮遜是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傳教士，於1807年到廣州宣教，傳教之餘還從事聖經翻譯及編纂字典，此外還在馬六甲成立英華書院(後遷至香港)。1834年病逝於廣州，安葬在澳門基督教墳場。為紀念馬禮遜，一些在華英美人士及商家遂成立馬禮遜教育協會。

1839年，馬禮遜教育協會邀請鮑留雲牧師(Rev. Samuel Brown)擔任澳門馬禮遜學校校長，當時該校只有六名學生¹。鮑留雲認為必須以培養獨立、批判性思維的教學方法取代中國傳統的教育模式。除了英語教學，學童必須學習中文、地理、算術等科目，以認識真理。



▲馬禮遜牧師畫像(圖片來源：The Literary &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Newcastle)

¹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1841, p. 53..



◀ 鮑留雲牧師畫像（圖片來源：倍加運動委員編『日本基督教会史略』,協力伝道局事務所，大正11.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1841年香港開埠，馬禮遜學校由澳門搬到香港。第一任港督砵甸乍是馬禮遜教育協會的贊助人之一，他在1842年2月22日批地給馬禮遜教育協會，助其於港島東一個山丘上建校，故稱此山稱為摩利臣山 (Morrison Hill)²。馬禮遜學校在1843年11月1日開辦，所在地點為內地段84號 (Inland Lot No. 84)³。

學童寄宿在馬禮遜學校，當時的上課時間為朝六晚九⁴。學童大部份時間都跟鮑留雲夫婦一起相處，生活尤如家人一般⁵。無形之中，他們學懂了西方待人接物的方式，對日後的工作有莫大裨益。有一些學生就讀了一年已經獲聘請到上海工作，他們獲得亦得到不錯的評價^{6 7}。另外，鮑留雲牧師亦用心設計了很多方法讓學童有效地學習英文，其一是將一千二百個英文片語翻譯成中文，刊印出來讓學童反覆學習^{8 9}。當學童慢慢掌握英語運用後，鮑留雲牧師便要他們不時要作文和嘗試翻譯¹⁰。

1847年，鮑留雲牧師因健康問題回美國，同時亦帶了容閱、黃寬及黃勝到美國留學。第二任港督戴維斯 (John Francis Davis) 上任，停止了對馬禮遜教育協會的資助¹¹。在缺少了支持下，馬禮遜學校於1849年關閉。

2 Eitel, *Europe in China*, p.186.

3 Ibid, p.190;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 1843, p. 620.

4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1841, p. 569.

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1841, p. 570.

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V, 1845, p. 475.

7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V, 1845, p. 476.

8 林準祥，〈第一代學堂教育〉，《香港·開講 - 歷史新篇》，中華書局，香港，2019年，163-175頁。此章節完整闡述鮑留雲牧師如何設計英語教學方式。

9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 1842, p. 551.

10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 1846, p. 608.

11 *The Impact of Mission Schools in Hong Kong (1842-1905) On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 A Comparative Study*, Leung Kwong Hon, Phd Thesis,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7, p.55.

當時馬禮遜學校的學生資料，有其入學年份、籍貫等¹²。根據施其樂的研究，其中 Achik 為唐廷植、Akü 為唐廷樞、Afu 為唐廷庚，即唐家三兄弟¹³。而 Ashing 為黃勝、Awing 為容閱、Afun 為黃寬。

CATALOGUE OF THE PUPILS THAT HAVE BEEN, AND NOW ARE IN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SCHOOL.

Names.	Age at ent.	Residences.	When entered.	When dismissed.	Remarks.
Aling,	16	Macao,	Nov. 4th, 1839.	Oct. 12th, 1840.	Dismissed for bad conduct.
Ashing,	15	Macao,	Jan. 1st, 1841.		
Akan,	14	Ngauhung lái	March 1st, 1840.		
Ats'ekuk,	14	Shánchéung,	Nov. 4th, 1839.	Aug. 19th 1840.	Driven from the school by his father. Returned again June 1st, 1842.
Awán,	13	Macao,	March 1st, 1840.		
Awing,	13	Námping,	Nov. 1st, 1840.		Dismissed for idleness.
Ahóp,	12	Tsin shan,	Nov. 11th, 1839.	Feb. 10th 1840.	
Ayún,	11	Shánchéung,	Nov. 4th, 1839.	Aug. 19th 1840.	Removed by father. do. do.
Awai,	11	Shánchéung,	do. do.	do. do.	
Achik,	11	T'óngká,	do. do.		
Afín,	11	Tunggón,	Mar. 13th, 1840.		Dismissed for bad conduct.
Tinyau,	11	Námping,	Mar. 2 nd th, 1840.	June 28th 1840.	
Alun,	10	Macao,	Mar. 16th, 1840.	June 30th 1840.	Dismissed for repeatedly going home without liberty.
Akú,	10	T'óngká,	Nov. 1st, 1841.	Jan. 1st, 1842.	
Ats'au,	12	T'óngká,	do. do.		
Ayuk,	11	T'óngká,	do. do.		
Ayún,	14	Shántau ün,	do. do.		
Alik,	11	Kúnt'óng,	do. do.	Jan. 1st, 1842.	Dismissed as unpromising last.
Amí,	12	Námping,	do. do.	do. do.	
Akwái,	11	Ngái hau,	do. do.	do. do.	
Atsám,	11	Shántau ün,	do. do.	do. do.	
Apó,	11	Pátsz shek,	do. do.	Nov. 14th 1841.	Dismissed for idleness.
Atsó,	12	Shéungtsák,	do. do.	Nov. 6th, 1841.	
Abung,	11	Shéungtsák,	do. do.	Nov. 7th, 1841.	} Brothers, ran away.
Afúnlan	11	Haubáng,	do. do.	Nov. 1st, 1842.	
Alam,	11	Hámí,	do. do.	do. do.	} Removed by their parents when the school was taken to Hongkong.
Afai,	13	Káhok,	do. do.	do. do.	
Ach'ing,	12	Káhok,	do. do.	do. do.	
Alammuk.	10	Pátsz shek,	do. do.	do. do.	
Ashing,	15	Ningpo,	April 7th, 1843.		
Ahing,	15	Samchau,	do. do.		
Afai,	14	Whampoa,	do. do.		
Ashín,	13	Whampoa,	do. do.		
Shinsz,	10	Nanking,	do. do.		
Aló,	12	T'óngká,	do. do.		
Alí,	11	Santsún,	do. do.		
Akwong,	10	Whampoa,	do. do.		
Lánsz,	9	Nanking,	do. do.		
Kwongchó,	9	Tinghái,	May 15th, 1843.		
Ayamau,	9	Macao,	April 7th, 1843.		
Afín,	8	T'óngká,	do. do.		
T'insau,	18	Singapore,	Sept. 1st, 1843.		

◀ 馬禮遜學校的學生名單，唐家三兄弟、黃勝、容閱及黃寬的資料均列於表上（圖片由作者提供）

馬禮遜學校雖然短短運作了幾年，卻培育出幾位精英，為香港及中國作出貢獻。以下茲舉數例：

唐家三兄弟，唐廷植、唐廷樞及唐廷庚均於香山唐家灣出生，分別於1839，1841及1843年入讀馬禮遜學校。畢業後他們均曾擔任翻譯工作，作怡和洋行買辦或招商局買辦等，為中國與外國貿易發揮巨大貢獻。

容閱，1840年11月入讀澳門馬禮遜學校，1846年隨鮑留雲夫婦到美國，於麻薩諸塞州的孟松城學校就讀。後入讀耶魯大學，4年後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耶魯大學歷史上第一個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容閱學成後回到中國，積極提倡及實行留美幼童計劃，當中表表者為唐紹儀、詹天佑、周壽臣等。周壽臣晚年更被稱為「香港大佬」，可見他對香港的重要性¹⁴。

¹²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 1843, p. 623

¹³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Cart T.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4.

¹⁴ 劉蜀永，〈容閱家族的香港情緣〉，香港地方志中心，香港，2020年。（<https://www.hkchronicles.org.hk/志趣古今/專題文章/容閱家族的香港情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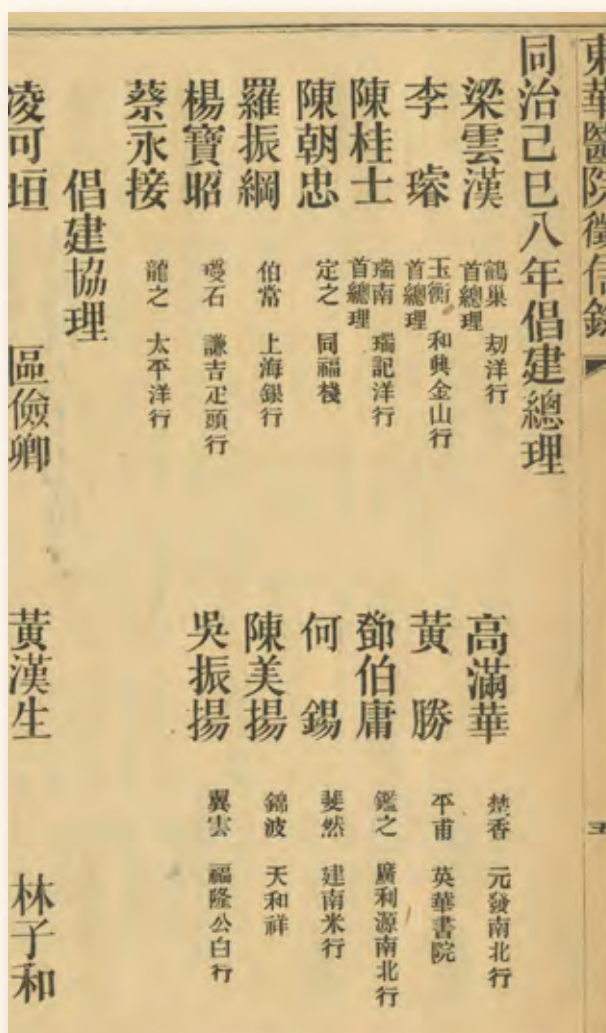
容閱的兒子容觀彤，其英文名字是Morrison Brown Yung；Morrison與父親就讀馬禮遜學校有關，Brown則是容閱之老師鮑留雲牧師的名字，可見馬禮遜學校對其之影響。容觀彤同樣於美國耶魯大學畢業，1925年獲港府批准在深圳與香港交界的蓮麻坑村採礦。容氏經營了礦場8年，最後葬於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¹⁵。

黃寬，1840年3月入讀澳門馬禮遜學校，1847年跟隨鮑留雲牧師赴美留學，其後於蘇格蘭愛丁堡大學修讀醫學，1855年畢業，成為第一位留學歐洲的中國醫生。黃寬於1857年回港，在倫敦傳道會所開設診所及傳教，後轉到廣州行醫，最後擔任粵海關醫生¹⁶。

黃勝於15歲就讀馬禮遜學校，1847年隨鮑留雲牧師及同學容閱、黃寬到美國留學，但一年後因身體問題返港，後加入《德臣西報》及英華書院做印刷和翻譯工作。1870年，黃勝參與創建東華醫院，成為倡建總理。1874年，協助同學容閱帶領中國第二批幼童到美國留學。1884年，港府邀請其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黃勝唯一存世的照片（圖片來源：東華三院文物館）



《丁丑年（1877年）東華醫院徵信錄》，黃勝名列十三名創院總理之一，亦是唯一一位以非商人身份入局的總理（圖片來源：東華三院文物館）

15 同上註。

16 蘇精，《西醫來華十記》，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台灣，2019年，頁157-190。

據梁廣漢博士研究，1860至1870年代，在香港能說英語的精英，大多在馬禮遜學校、英華書院和聖保羅書院接受教育，足見馬禮遜學校的影響力¹⁷。

馬禮遜學校結束後，在摩利臣山校舍的藏書，於1869年送到第一代大會堂圖書館，因為公眾較少借用的關係，藏書於1914年轉到香港大學圖書館至今^{18 19}。另外，由馬禮遜教育協會於1873年成立的「馬理遜獎學基金」，現在仍惠澤皇仁書院學生。1934年，港府就此基金制訂了《馬理遜獎學基金法團條例》，條文清楚指出基金受託人委員會須由皇仁書院校長、倫敦傳道會高級傳教士及佑寧堂牧師組成²⁰。至1990年，時任立法局議員司徒華認為當時基金數目龐大（達二千二百萬元港幣），必需更嚴謹管理，兼且基金受託人之一的倫敦傳道會已經撤離香港，故需要修例²¹。最後條例獲修改，與馬禮遜有莫大關係的倫敦傳道會終被剔除在外²²。

傳道會醫院

另一個早期便扎根於摩利臣山的的就是傳道會醫院（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of Hong Kong）。傳道會醫院成立於1843年，當時成立的背景是西方來華傳教士均以醫療傳道方式宣教，此舉既符合新教神學的標準，亦可減低華人對傳教士的反洋情緒²³²⁴。傳道會醫院於1843年6月1日啟用，合遜醫生（Dr. Benjamin Hobson）為第一任醫院主管²⁵。傳道會醫院是香港第一間醫治華人的西式醫院，醫院設有6間病房，可容納36至40位病人²⁶。傳道會醫院於1853年關閉。

海旁東填海計劃至六十年代摩利臣山之變化

自馬禮遜學校及傳道會醫院結束後，摩利臣山上沒有太多發展。1921年，海旁東填海計劃（Praya East Reclamation Scheme）啟動，摩利臣山從此不一樣。除了二戰日據時期外，由1920至1960年代，摩利臣山都是處於被開採山石的狀態。

海旁東填海計劃在1897年已有構思，就是將摩利臣山夷平，所開採之山石則作填海之用²⁷。而剩下的平地，則會修築兩條貫穿摩利臣山的道路，一條連接黃泥涌道及克街，另一條連接皇后大道東及禮頓山道（今禮頓道）²⁸。1921年，計劃改為將

17 *The Impact of Mission Schools in Hong Kong (1842-1905) On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 A Comparative Study*, p.332.

18 *Hong Kong Daily Press*, 31 Mar. 1869.

1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4 Dec. 1914. ; Dorothea Soctt, "The Morrison Library a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1 (1961), p.50-67.

20 Morrison Scholarships Fund Ordinance, 1934.

21 司徒華，十年風雨聲第三十七篇-馬理遜獎學基金，https://www.szetowah.org.hk/司徒華作品彙編/十年風雨聲/十年風雨聲37_馬理遜_學基金/。

22 香港條例，第1037章《馬理遜獎學基金條例》。

23 基督新教入華初期的醫療傳道事工，葉深銘http://www.tkps.edu.hk/v2/010_about/010-080-040_chist/reading_share/ip/2016.pdf；

24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中華書局，香港，2018年，23-24頁。

2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 1843, p. 441.

2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 1843, p. 442.

27 "Praya East Reclamation Scheme – Final Report",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Hong Kong, Noronha & Co, 1931, No.1, pp. 1.

28 CO129/403, pp.442-466.

其中一條路連接黃泥涌道及杜老誌道（新填道路）²⁹。工程由生利公司(Messrs. Sang Lee & Co.) 承辦。1921年11月1日，填海工程開始，最初預計此項工程可以在1927年10月31日完工，但不幸地工程遇上種種困難，首先是海員大罷工，工潮影響工作進度，此外是摩利臣山所含花崗岩太多，難於開採（最初估計是花崗岩佔整個山百分之五，但工程期間發覺佔百分之三十五），故此導致工程延誤及成本上升³⁰。



▲ 填海工程已近完成，大片新土地的右側為開採中的摩利臣山（紅圈所示），攝於約1920年代（圖片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



▲ 1930年填海竣工，新土地上迅速建成新樓（圖中右上方），而被大幅開採的摩利臣山體積明顯變小（紅圈所示），攝於約1930年代（圖片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

29 CO129/469, pp.445; "Praya East Reclamation Scheme – Final Report", pp. 1.

30 《華字日報》，1925年3月21日；"Praya East Reclamation Scheme – Final Report", pp. 8.

1930年，填海工程完畢，是次填海共填出逾三百七十萬平方英尺土地，範圍由西起軍器廠街、東至波斯富街、南面由莊士敦道起，至北面告士打道。而所需之山石，來自摩利臣山、東角山（即利園山）及其他工程之廢棄泥土³¹。但摩利臣山仍未完全「移去」的關係，最初建造兩條貫穿摩利臣山道路的計劃無法實現。1947年，港府委託馬士文公司（Marsman Ltd.），繼續開採摩利臣山石礦。港府在一份報告上指出，開採石礦非常重要，因為當時用於混凝土工程的碎石的價格高得驚人，故採石有助減低成本³²。是次開採的石材亦用於1950年代北角填海。開採摩利臣山估計在1964年結束^{33 34}。

1955年1月，會德豐主席約翰·馬登（G. E. Marden）將英國工程公司建議的跨海大橋計劃遞交至港府。該計劃建議以摩利臣山為起點，建造一條長1.5英里（約2.4公里）的大橋橫跨維多利亞港，終點是尖沙咀漆咸道，工程費用約為一億零四佰萬港元³⁵。1957年9月，港府研究跨海大橋之可能性，而摩利臣山地段有機會成為大橋之起點，故港府將此地段暫停發展兩年³⁶。



▲ 摩利臣山已幾近平地（紅圈所示），攝於1956年（圖片來源：高添強先生）

31 Praya East Reclamation Scheme – Final Report”, pp.1-10.

32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HKRS156-1-1111, “SQUATTERS CAMP AT MORRISON HILL - ERECTION OF -”.

3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6 Dec. 1950.

34 《華僑日報》，1964年11月3日。

35 《華僑日報》，1955年1月21日；*The China Mail*, 20 Jan. 1955.

36 《工商晚報》，1957年9月5日；《華僑日報》，1957年9月6日。

1959年8月，港府同意延長摩利臣山保留計劃至1960年9月。最終港府確定不在摩利臣山興建隧道出入口，故於1961年開始規劃該區土地。港府檔案文件指出，據1961年人口普查，灣仔人口約有十八萬六千人，預計灣仔將有更多私人樓宇建成，而摩利臣山地區為灣仔區內唯一一片未開發的公有土地，故港府認為必須善用此片土地，興建如學校等社區設施，為政府及社區服務。

此文件基本上已規劃出摩利臣山一帶的道路和公用設施建設藍圖，包括學校、停車場、車房、醫院及公眾空間（現摩利臣山泳池）等等，整體上跟現今已沒有太大分別。唯獨是計劃中的停車場現在是鄧肇堅學校，而車房則是伊利沙伯體育館³⁷。

不過在此段發展期間，卻揭開了一個二戰的悲慘故事。1957年8月31日，香港華仁書院對開摩利臣山一帶，發現四大缸白骨，警方接報查探，初步估計骸骨是日據時代被害之人。當日港府亦有派陸軍作調查，曾經懷疑骸骨屬印度士兵，但港府隨後否定這個說法³⁸。港府法醫張天聞研究後指出，骸骨屬於華人，大部份更是屬於小孩³⁹。後來有兩位市民指出，她們在1941年12月期間親眼目擊飛機轟炸該地方，導致多人死亡。其中一位更清楚指出，當時多名市民在摩利臣山一帶排隊等候食物，飛機轟炸後，一批市民受傷或身亡，但不久又為了食物恢復排隊，如是者該地市民再受襲擊，前後重覆了三次。另一位則指她的母親、丈夫、三名兒子在是次襲擊中身亡。港府指是次共發現了32具骸骨，3具屬於老人、6具屬於25歲以下的人、4具屬於少年或更年少的人，還有3具屬女性⁴⁰。

1964年11月，港府在摩利臣山開闢為臨時住宅區，以供無家可歸之居民及危樓住客戶作臨時棲身之用⁴¹。1965年5月，港府讓荷李活道238號至244號及皇后大道西74號兩處危樓居民合共500人，在此搭建木屋居住⁴²。由於此區是臨時安置災民的關係，港府基於經濟效益，不在這裏裝設街燈，最後此木屋區在1966年清除⁴³。

1972年，香港第一個全季候（即冬季有暖水服務）公共游泳池在摩利臣山建成。游泳池共有三個泳池，分別為室內50公尺主池、露天兒童游泳池及嬉水池，最多可容納1,200名游泳人士⁴⁴。

另外，1979年，伊利沙伯體育館（又名新伊館）在愛群道建成。

37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HKRS1039-3-5, "MORRISON HILL AREA - LAYOUT PLAN".

38 《華僑日報》，1957年9月2日；The China Mail, 2 Sep. 1957.

39 《華僑日報》，1957年9月4日；The China Mail, 3 Sep. 1957.

40 The China Mail, 6 Sep. 1957.

41 《工商晚報》，1964年11月1日。

42 《工商日報》，1964年3月3日。

43 《工商日報》，1966年5月4日。

44 《大公報》，1972年10月31日。

摩利臣山附近街道、店鋪及建築物的故事

灣仔摩利臣山皇后大道東一帶，以往曾經叫噏道（其實是英文Gap Road的音譯），但這條街名上有另一個名稱，就是掘斷龍街，為甚麼有這個名字？據說是開路的時候掘斷龍脈有關。1936年8月9日，香港工商日報一篇名為「掘斷龍」的文章，有趣地介紹了這一個名字的來由：

掘斷龍一個名詞，相信是居留紅香爐峰的同胞們，個個都知道一段故事，然而，知道清楚的很少呢，紅香爐峰的龍脈在哪裏？怎會掘斷呢？據詳審其中情形的老者說，香港的龍脈，是在現在灣仔嘍道（即噏道），風水先生觀察這條龍脈，乃由紅香爐經嘍道，蜿蜒至燈籠洲火藥庫，向北伸至紅磡漆咸道，香港的一興一衰，這個地帶是有很重要關係的。

現在香港的百業衰退，一般迷信風水的大致說：「香港的龍脈掘斷了，怎不……」。據查香港的龍脈的掘斷，是在數十年前了，當時快活谷的跑馬場新近完成，沒有康莊的大道貫通灣仔和中環，政府為利便這兩方面的交通起見，就把快活谷和灣仔隔離的荒山開闢為今日的嘍道，當大興土木的當兒；有一天工人們持着鋤頭埋頭力掘，忽然銀朱色的血水，從地層下噴將出來，斑斑然源源不絕，同時還紅光萬丈，直沖九霄，嚇得工人們，個個都目瞪口呆，於是一般人說：「香港的龍脈遭掘斷了」，當時工人們，便相繼染病死了百幾十人，不敢工作了，後來政府為着趕緊完成這條嘍道，幾經強迫和曉諭，才能夠底於成呢。

有趣的是，這條道路的掌故可不只是華人流傳，外國人亦曾在報導中提及掘斷龍：

.....by Queen's Road East we come to Morrison Hill Gap Road. This road is still known sometimes among the Chinese as the Cutting that broke the Dragon's Back – kwat-tun-lung⁴⁵.

4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July, 1932.

噏道於1949年成為皇后大道東一部份⁴⁶。

值得一提的是，有兩間名噪一時的商店曾在摩利臣山營業，但卻鮮為人知。首先是曾福琴行。曾福琴行在香港相當出名，其眾所周知的產品「摩利臣」鋼琴（Morrison Piano）原來跟摩利臣山有關。曾福琴行相信是創辦於1915年（雖然在其網站上看到琴行是創辦於1916年，但其廣告曾於1915年刊登，故此有理由相信琴行是創辦於1915年）⁴⁷ ⁴⁸。根據報章上曾福先生的訃聞，指出琴行的工場最初設於摩利臣山，「摩利臣」鋼琴之名相信跟當時廠房的位置有莫大關係⁴⁹。從報章上看到曾福琴行的廣告，當時工場位於灣仔道94A，翻查當時舊地圖及街道索引，該地址是香港內地段111號（Inland Lot No. 111）⁵⁰。對比現今地圖，位置是現今英皇集團中心（面向灣仔道一面）。

另外一間是Brown, Jones & Co.（福祿壽殯儀館），是香港早期從事殯儀行業的店舖之一。根據York Lo的研究，Brown, Jones & Co.於1870年代成立。1910年代，公司設於摩利臣山道41號（即現今愉景樓位置）。1930年代，遷到摩利臣山道45號⁵¹。Brown, Jones & Co. 過往承辦過不少名人之後事，如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之葬禮，就是他們所承辦⁵²。該公司所製之墓碑，現今仍可以在跑馬地香港墳場裏找到。或許是跑馬地有多個墳場的關係，香港有很多殯儀公司也設在摩利臣山一帶，如摩理信殯儀、李璇殯儀等⁵³。

摩利臣山一帶，亦是工業人才的培訓基地，很多歷史悠久的工業學院及學校均在這裏發展。1930年代，港府為發展重工業，在灣仔活道開辦官立高級工業學校，校舍於1936年8月29日建成，樓高三層⁵⁴。1937年2月，工業學校開課。1938年4月12日，正式開幕⁵⁵。1947年，易名為工業專門學院⁵⁶。1957年11月，工業專門學院搬遷到九龍漆咸道加士居道交界，後來成為理工學院，直至1995年升格為理工大學。維多利亞工業中學（前身為初級工業學校）則遷入灣仔活道校舍⁵⁷。1979年，維多利亞工業中學遷到愛群道5號，並易名為鄧肇堅維多利亞工業中學⁵⁸。而人稱「紅磚屋」的活道校舍，則於1988年開始拆卸⁵⁹。

46 《華僑日報》，1949年3月6日。

47 曾福琴行公司簡介：http://estore.hktsangfook.com/index.php?route=information/information&information_id=4

4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Jul. 1915.

4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Apr. 1940.

50 Arthur Chapman, *Index to the Streets, House Numbers, and Lots of the City of Victoria, the Hill District, Wongneichong, Shaukiwan Road, Tai Hang, Tung Lo Wan, Quarry Bay, Saiwanho, Shaukiwan, Pokfulam, Aberdeen, Kowloon Point, Yaumati, Mongkoktsui, Taikoktsui, Fuktsunheung, Hungghom and Kowloon City Road in the Colony of Hongkong*, Hong Kong: Noronha & Co., 1910, p.99.

51 York Lo, *Brown Jones, Morrison and Joseph S. Lee – Pre-War Pioneers of the Death Care Industry*, <https://industrialhistoryhk.org/brown-jones-morrison-and-joseph-s-lee-pre-war-pioneers-of-the-death-care-industry/>

52 《大公報》，1940年3月6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6 Mar. 1940.

53 《華僑日報》，1947年7月10日。

54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The Year 1936, Appendix Q,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Year 1936*, Q11.

55 《工商日報》，1937年2月21日。

56 《華字日報》，1938年4月13日。

5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 Nov. 1957.

5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 May. 197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Jun. 1985.

5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Aug. 1988.

隨着香港工業蓬勃發展，工業界對技術人才有極大需求，1968年港府決定在愛群道興建工業學院（後定名為摩利臣山工業學院），讓中學畢業生就讀職業先修課程⁶⁰。學院於1969年11月建成，樓高6層，設有16間班房、四間演講廳及圖書館等設施⁶¹。1982年，成為職業訓練局轄下的工業院校。1999年，改名為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利臣山分校。灣仔戰前活道校舍（即維多利亞工業學校舊址）拆卸後，於1992年重建成19層高的職業訓練局大樓及摩利臣山工業學院的後座⁶²。工業或高科技的培訓故事，仍在摩利臣山延續。

留下的石頭、留下的故事

摩利臣山經歷數十年的開採，如今已夷為平地，舊物舊事，似乎都只可在書本、檔案中尋找。不過，各位讀者若細心逛逛摩利臣山範圍，或許會找到不少驚喜。

在摩利臣山愛群道28號愛群閣旁的花圃內置有一塊大石，石身有很多孔洞，應該是經「爆石」方式開採而留下的。以前，工人會以工具在石上開鑿一條條炮孔，之後放入炸藥和引爆裝置，再進行引爆，將大石從岩體分離。此石明顯有炮孔，很有可能是山上石礦經開採後，被置於此處作裝飾。



▲ 愛群道上的石頭（圖片由作者提供）

6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 Jul. 1968.

6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Nov. 1969.

62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 Feb. 1992.

另外，在摩利臣山道遊樂場內，有一塊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設置的紀念牌匾，記錄了1898年5月，有三位菲律賓人－Marcela、Lorenza，及Delfina Herbosa Natividad，在現今遊樂場現址附近，親手縫製了菲律賓國旗，為菲律賓獨立運動作出貢獻的事跡⁶³。



▲ 古物古蹟辦事處所設置的紀念牌匾，現位於摩利臣山道遊樂場。（圖片由作者提供）

筆者不才，本文只是蜻蜓點水式的探討摩利臣山的歷史。這一個小小的山丘，卻孕育了不少人物，對香港的慈善、經濟及當時清政府作出巨大貢獻。它的天然資源，成為灣仔和北角的基石。若能再深入探究，或許會更發掘出更多有關香港殯儀業、菲律賓及葡萄牙族群在香港的歷史。



6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Jun. 1998；《香港文物》，第二卷，第四期，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1999年4月，p.24-25.



集善醫院的前世今生： 戰前灣仔的華人醫療發展

盧淑櫻

前言

灣仔又名「下環」，地處維多利亞城的邊陲，自十九世紀中後期，已有不同種族和國籍的人士居住。隨着人口不斷上升，灣仔居民對醫療的需求與日俱增。本文透過華陀醫院、集善醫院到東華東院的興替，討論戰前灣仔的歷史發展及本地華人醫療服務的變遷。

人口增加

香港開埠初期，殖民政府在香港島北面建設維多利亞城，當中可分為四環九約，而灣仔就位於下環，即軍器廠街至灣仔道一帶。如果以行政區域劃分，灣仔屬於第七和第八約¹。今天灣仔北部的土地，是經過多次填海而形成；土地不斷增加，帶動該區人口上升。表一顯示1841至1861年維多利亞城的非歐籍人口。下環的人口紀錄由1858年開始，當年有4,861人，一年後升至5,581人，及至1860年，下環的人口已突破6,000人，而且持續增加，到1861年有6,641人。

二十世紀初的灣仔已是個商業繁盛、人口密集的地區。表二顯示1921和1931年港島衛生約的人口，灣仔橫跨第1區、第1A與2A區，以及第2區。1911年，衛生約第2區的人口為25,629²。1921年，第2區人口加至27,647人，成為灣仔人口主要的集中地。1A和2A區的人口也不少，合共接近27,000人，到1931年，第2區的人口突破33,000人。至於人口增長最多是第1區，1931年有27,126人，比十年前增加約9,000人。

1 「四環」是指西環、上環、中環和下環；至於「九約」則是九個不同的行政區域。根據《香港年鑑（一九三四年）》，第七約包括大王東街、大王西街、太和街、汕頭街、聯發街、隆安街、廈門街、晏頓街、交加街、日街、月街、星街。第八約包括麼理臣山道、普樂里、茂羅街、靈西街、伊榮街、交加里、巴路士街、克街、唸道、天樂里、置成里、寶靈頓道。丁新豹、黃迺錕：《四環九約》（香港：香港博物館，1994），頁6-8；《香港年鑑（一九三四年）》（香港：華僑日報，1935），（地）頁9-10。

2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for 1911," *Sessional Paper 1911*, p. 105.

灣仔人口上升亦可從住屋需求反映。192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提及，由北角至海軍船塢的人口達38,215人，比1911年增加一倍。自從分域船塢（Fenwick’s Engineering Yard）以及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開辦的聖童之家（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遷離灣仔海旁，該地段築起了多幢小型的兩層高樓房，1911年尚有空置單位，但到1921年已全部爆滿。由晏頓街至灣仔道，每平方畝便有1,410人，是當時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地方。不少外籍文員和小公司售貨員，因無能力購買或租住半山的樓房，於是選擇落戶灣仔，令該區成為二十世紀初港島受歡迎的住宅區³。

表一. 維多利亞城非歐籍人口，1841-1861

	1841	1844	1858	1859	1860	1861
上、下市場	800	5,783	-	-	-	-
太平山	-	-	11,599	13,549	15,782	17,828
中環	-	-	11,434	10,428	10,585	15,875
上環	-	-	6,626	7,449	8,337	9,549
西營盤	-	-	4,618	4,989	7,515	9,123
石塘咀	-	-	727	662	1,925	
下環	-	-	4,861	5,581	6,072	6,641
掃桿埔	-	-	2,601	2,020	2,373	2,583
黃泥涌	-	-	333	374	327	359

資料來源：Ho Pui Yin, *Challenges for an Evolving City: 160 Years of Port and L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2004), p. 65, table 1.8

表二. 香港島衛生約人口，1921-1931

區域	1921	1931
北角	3,108	12,581
海旁東 (Praya East)	-	8,321
1: 銅鑼灣、寶靈頓、黃泥涌	18,139	27,126
1A & 2A: 灣仔	26,956	29,747
2: 灣仔	27,647	33,007

資料來源：“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for 1921”, *Sessional Paper 1921*, Table 1, p. 172;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931,” *Sessional Paper 1931*, Table 3, p. 103.

3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for 1921,” *Sessional Paper 1921*, p. 153.

華人醫院興替

人口增加帶動對醫療的需求。香港最早興建的醫院均座落於灣仔，包括位於醫院山的海員醫院 (Seamen's Hospital)，以及摩利臣山的傳道會醫院 (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 of Hong Kong)，兩間醫院均建於1840年代初。灣仔也有多間教會醫院，包括早前提及的聖童之家內的一所小醫院 (即日後的聖保祿醫院)，以及嘉諾撒修會在皇后大道設立聖方濟各醫院 (St. Frances Hospital)⁴。港島區尚有1850年落成的國家醫院 (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1887年啟用的雅麗氏紀念醫院 (Alice Memorial Hospital)，以及1893年的那打素醫院 (Nethersole Hospital)。上述俱為西醫院，唯本地華人並不相信西醫，因此要求興建中醫院的聲音日漸壯大。有見及此，任職政府翻譯的范阿為，連同譚亦三、林德記和黃鳳雲等學校教員籌建華陀醫院。

華陀醫院成立於1867年，可謂香港首間中醫院。范阿為等公僕申請在太平山買地興建華人醫院，但政府以太平山一帶地皮貴重為由拒絕⁵。范阿為等人並未放棄，續向政府申請文武廟對面的土地，再次被拒。最後他們改為購入景星街和石水渠街交界地段，興建華陀醫院 (又名「灣仔街坊醫院」)，不過規模比最初構思的細小很多，極其量只可稱為藥局 (Dispensary)⁶。華陀醫院在1867年開幕，今天石水渠街72號藍屋⁷，仍保留昔日醫院的石額和對聯。



◀ 昔日華陀醫院的石額和對聯仍保留至今 (圖片由作者提供)

4 1857年，羅馬天主教於在港島的聖佛蘭士街 (St. Francis Street) 建立醫院，但僅運作一年便關閉。Carl Smith,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 Co., 1999), p. 147; 申頌詩 (Josefina Santos) 著、馮彩華譯：《追隨聖保祿的足跡：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九八年》(香港：出版社，2011)，頁18。

5 這幅土地其後批予梁雲漢等人興建東華醫院。開埠初期，殖民政府不願承擔華人醫療開支，並把責任交予華人自行解決，所以政府會考慮負責的華人機構有否足夠的能力尤其財力，承擔龐大的醫療費用。對比范阿為等公僕及教師，東華的創院總理絕大部份是洋行買辦、南北行商以及各行各業的頭領，有雄厚資本和人脈網絡，為醫院籌募經費。Elizabeth Sinn, *Power of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2.

6 Sinn, *Power of Charity*, pp. 31-32.

7 1920年代初，華陀廟所在的兩層高物業遭出售和拆卸，再重建成四幢四層高的唐樓，工程在1925年完成，按當時地政署的紀錄，新的門牌編號是石水渠街72至74A，即今天人稱的「藍屋」。華陀廟在72號地下「重建」，建築物外牆加入不少中式廟宇元素，包括大門上加設琉璃瓦片造成的簷頂，並配置寶珠、鯨魚等符飾。見拙作：《東華歷史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9)，頁148-149。

華陀醫院以慈善機構方式營運，經費由下環小商戶與街坊捐助，但規模遠比東華醫院（以下簡稱「東華」）細小。華陀醫院曾向政府申請擴充，收容留院病人，時任首席醫官Dr. Lister視察後，雖接納其申請，但申請最終不獲資金委員會批准。1872年，華陀醫院去信東華要求合併，同樣遭拒絕。其後華陀醫院的Leung King Him和Leung Shun Ng被指誹謗管理委員會成員挪用政府發給華陀醫院的公款，從此華陀醫院與東華有着不同的待遇，最終華陀醫院在1886年關閉⁸。

儘管政府醫官曾形容華陀醫院「清潔及有秩序」，但醫院的資源有限，醫師的質素成疑。1881年《循環日報》報道了華陀醫院聘請醫師的情況。該院每年聘用醫師的經費，均由豬肉行捐出，1881年的款項為120元。相比之下，東華的總理來自洋行買辦和各行業翹楚，資金、籌募和動員能力遠勝華陀醫院，亦突顯了後者作為地區醫療機構的局限性。至於當年受聘的醫師是年過六十的封翊臣，他來自東莞，經過多次卜杯後獲聘⁹。該則新聞報道反映華陀醫院欠缺系統化和有效的方法去考核醫師的資格，加劇殖民政府對中醫的質疑。

縱然規模細小、資源有限，華陀醫院卻能為下環居民提供適切的醫療服務。如前所述，十九世紀末，港島雖有數間西醫院，但華人並不信任西醫，何況醫院數目亦寥寥可數。至於位處上環的東華醫院，距下環頗遠。加上受金鐘的軍事用地阻隔，下環居民要多花時間及車資，才能抵達東華求診¹⁰。華陀醫院確實能為下環以至港島東的居民提供有限的中醫服務。

華陀醫院營運廿載便在1886年關閉，轉型為廟宇。由於華陀像仍保留在醫院原址，善信繼續前往拜祭，所以不晚於1910年代，華陀醫院變身成華陀殿，大門的石額亦被寫上「華陀殿」的牌匾掩蓋（圖二）。自此灣仔有一段長時間沒有中醫院，遇有疫症頑疾，當地居民只能求神問卜，聽天由命。例如，1919年6月，下環鵝頸一帶多人染病，送往東華和國家醫院救治¹¹。在苦無對策下，街坊唯有抬神像出遊驅瘟¹²。

8 《故園故事》（香港：灣仔區議會，2007），頁35；Smith, *A Sense of History*, p. 147; Sinn, *Power of Charity*, p. 89.

9 《循環日報》，1881年3月1日，版4。

10 金鐘昔日是軍事重地，設有軍營（Wellington Barracks及Victoria Barracks）、彈藥庫和海軍船塢。

11 根據政府的醫務衛生報告，1918年有1,235人感染腦膜炎。翌年腦膜炎繼續肆虐，共269人染病；霍亂的威脅也不能忽視，確診者有46人；至於出現腸胃炎症狀者則有339人。由於報道指「時疫多為熱症」，即病者曾出現發燒症狀，因此估計當時肆虐下環可能是腦膜炎。“Report of the Head of the Sanitary Department,”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18*, p. M4; “Report of the Head of the Sanitary Department,”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19*, p. M4.

12 報章原文為「抬偶像出遊」，蓋作者不信奉中國傳統民間宗教，甚或是基督徒，故稱神像為「偶像」。《華字日報》，1919年6月26日，版3。



▲ 1910年華陀醫院的明信片，可清楚見到門前石額被寫上「華陀殿」的牌匾遮蓋（圖片來源：高添強）



◀ 華陀像，現存放於藍屋（圖片由作者提供）

眼見下環坊眾苦無中醫院，一群殷商和街坊於是籌建集善醫院（又稱「集善醫所」或「集善醫社」）。1921年，霍桃溪等人去信華民政務司，請求在灣仔建醫院，獲政府批准後開始籌集經費¹³。醫院位於皇后大道東98號地下，1921年7月27日開幕，由兩位中醫師駐診。集善醫院仿效東華向貧苦大眾贈醫施藥¹⁴，但規模則相形見绌。醫院設在唐樓地下，除卻醫生房和病房，還要放置各種醫療物品，地方絕不足夠，只能提供門診服務¹⁵。

集善醫院開業不久便要求納於東華名下。據丁新豹的研究，集善醫院在創始之時已出現問題，包括組織內部意見分歧、難以籌募經費等等。加上政府認為東華是唯一華人慈善機構，新建的醫院「亦應屬於東華醫院」¹⁶。故此集善醫院先後在1921年10月和12月去信東華懇求接收，並承諾會自行向東區街坊籌集經費，不花費東華分毫¹⁷。

東華在1920年代初面對各種挑戰，未有即時答允接收集善醫院；縱然在1924年5月議決接收，並改名為東華東院（以下簡稱「東院」），但最終在1929年落成啟用。財政負擔是東華最大的考慮，因要為新落成的廣華醫院（以下簡稱「廣華」）墊付經費。1911年成立的廣華，是東華在九龍半島首間醫院。有別於港島區，九龍半島缺少大洋行和商行，支持廣華的善長多為地區的小商戶（如布行、豬肉行）¹⁸，籌得的善款有限。何況香港與中國正值時局動盪之際，先有1899年鼠疫重臨香江，1907年又有天花橫行，踏入二十世紀，革命黨多次在廣東地區發動起義，政局緊張影響中港兩地經濟，可籌得的款項大打折扣。加上廣華的建築費用龐大，單是平整土地的費用已用了8,500元，整座醫院的建築費連同其他雜費更接近十四萬元，幾近耗盡政府撥款以及市民捐助¹⁹。又，廣華開辦後不久，便要接管油麻地痘局和水上醫局，令緊絀的財政更雪上加霜。縱然政府在1914年把油麻地天后廟的廟產和收入撥歸廣華，但天后廟值理到1928年才交出廟宇的控制權²⁰。東華唯有承擔廣華的支出，除卻每年向本地各行會、商會募捐，又會為廣華墊支經費，迄至1927年8月，東華總共墊支三萬二千元²¹。在沉重的財政負擔下，東華實難以在1920年代初營運第三間醫院。

13 霍桃溪又名霍桂兆或霍明發，廣東南海縣人，從事貿易、建築工程等生意，被譽為生意奇才。他既是香港中國交通洋行有限公司（China Agency & Trading Co. of Hongkong, Ltd.）的董事之一，也是多利順洋行（Thoresen Co. Ltd.）的辦房。霍氏亦是位慈善家，經常捐助不同的機構。例如，他於1914年捐出100元予Prince of Wales Fund；1915年捐200元予東華，救助廣東水災。霍氏亦曾捐助紅十字會和聖約翰救傷隊等醫療組織。1923年，霍氏成為東華總理，1923至1924年再出任保良局總理。《Hong Kong Dollars Directory 1922》（Hong Kong: Local Printing Press, Ltd., 1922），p. 16；馬冠堯：《香港工程考II：三十一條以工程師命名的街道》（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頁347；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編纂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香港：香港東華三院庚戌年董事局，1970），頁45；《South China Morning Post》，November 23, 1914, p. 3；《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uly 17, 1915, p. 8；《South China Morning Post》，October 22, 1915, p. 3。

14 集善醫院開辦的首三個月，共醫治10,527人（男性4,085人、女性4,185人、小童2,257人），施贈中藥8,741劑。〈一九二一至二二年度董事局會議紀錄（集善醫院一九二一年九月廿四日院務會議紀錄）〉，載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頁286-287。

1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May 14, 1924, p. 11。

16 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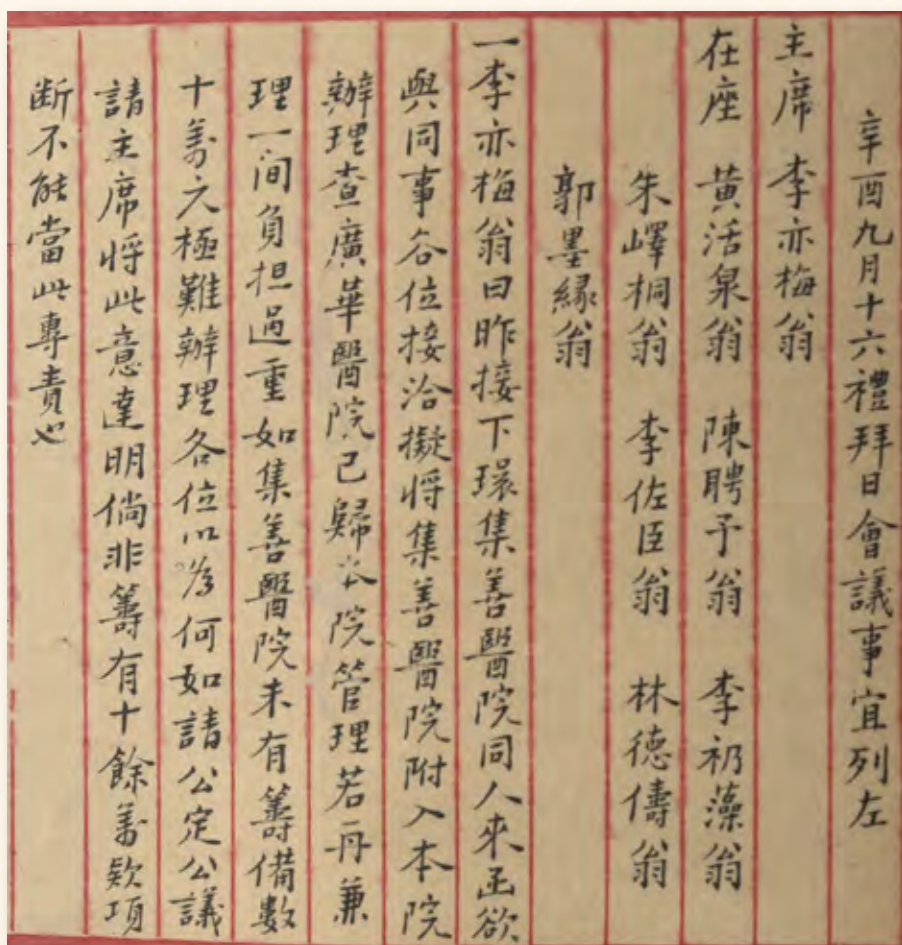
17 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編纂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頁123；〈一九二零至廿一年度董事局會議紀錄（東華醫院董事局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會議紀錄）〉，載何佩然編著：《源與流》，頁288-289。

18 廣華醫院開幕之際，蘇地（即油麻地）豬肉行和旺角染布行等機構，分別送上牌匾祝賀。東華三院檔案與歷史文化辦公室：《胞與為懷：東華三院文物館牌匾對聯圖錄》（香港：中華書局，2016），頁54-61。

19 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編纂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頁112。

20 現為法定古蹟的油麻地天后廟，建築年份已不可考，但估計在1865年以前經已存在。廟宇最初由水上人興建，臨海受潮使這座簡陋的廟宇損毀嚴重，加上地方細小，區內坊眾和商戶遂於同治九年（1870年）重建。期間遇上1874年的甲戌風災而毀，坊眾再籌錢重建，1876年在今日廟宇所在地動土，1890年落成啟用。從上述可見，油麻地天后廟與區內的商戶和民眾關係密切，他們的代表亦是廟宇的値理。由此說明何以天后廟値理拒絕交出廟宇控制權，直至1928年政府頒佈《華人廟宇條例》，天后廟値理才願意把全部廟產和歷年收入逾58,000元交付廣華。見拙作：《東華歷史散步》，頁92-95。

21 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編纂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頁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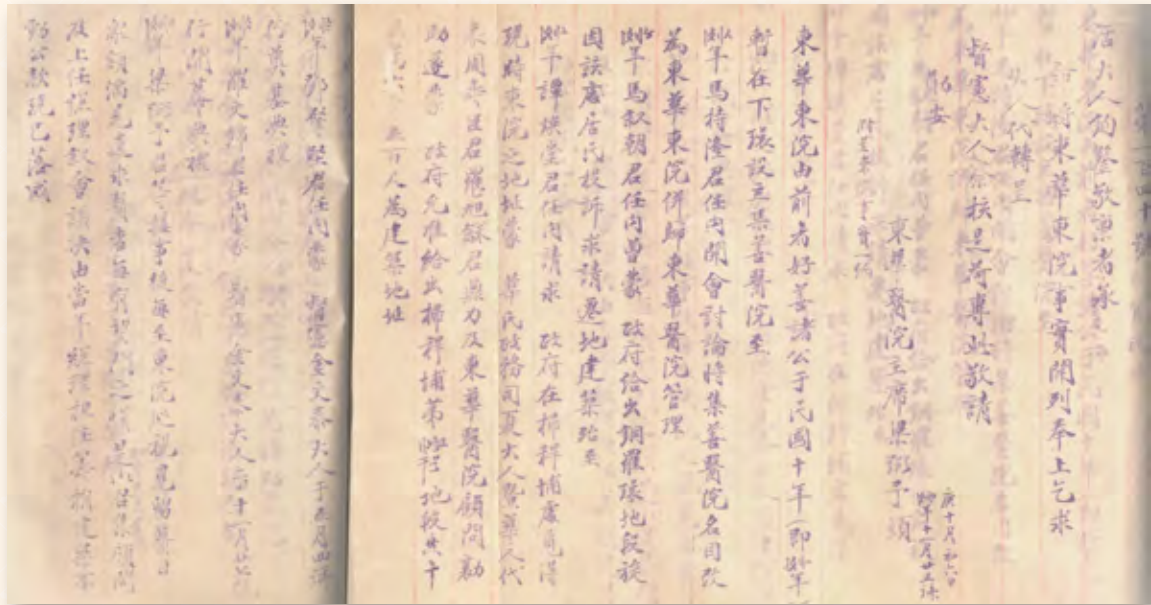
▲《東華醫院董事局會議紀錄》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當時董事局對接收集善醫院一事持謹慎態度（圖片來源：東華三院文物館）

政局動蕩也延後了東華接收集善醫院。1922年海員罷工期間，各行商紛紛致函東華，冀可出謀獻策盡早解決事件。於是東華接連多次召開緊急會議，未能兼顧集善醫院事宜。同年6月，廣東潮汕風災嚴重，東華忙於籌款賑災。1923年，內地兵禍、水旱風災接踵而來，國外則有日本關東大地災，死傷慘重，東華忙於四出籌款，賑濟海內外災民。加上1925年的發生省港大罷工，且長達十個月之久，東華總理分身不暇，只能推遲接辦集善醫院²²。

醫院的永久院址同樣經過多番轉折才能敲定。集善醫院地方嚴重不足，加上早已考慮建立永久院舍，所以需覓地建院。院方最初屬意灣仔公立醫局附近土地，但政府只批出數千平方呎地皮，地方有限。其後政府打算撥出天后廟一帶地方，但遭廟方以及附近商戶、業主和居民反對。於是政府擬批出掃桿埔一幅十萬平方呎土地，院方又以日後沒有足夠地方擴建為由拒絕。經過多番角力，政府最終批出掃桿埔2686號地段逾十五萬平方呎的土地興建新醫院，令東院成為了戰前東華三間醫院中面積最大的一所，主樓設有福壽康寧四大病房，提供床位共84個，於1929年11月27日開幕²³。

22 同上，頁123。

23 同上註；蔡俊臣：〈東華東院史畧〉，《東華醫院月刊》，第一期（1931年9月），頁20。



▲《東華醫院致外界函件》一九三零年第一百四十號，信中附件列出接收集善醫院所經波折（圖片來源：東華三院文物館）

東院是一所現代化的醫院。醫院由本港著名的建築公司巴馬丹拿 (Palmer & Turner Co.) 設計，採用折衷主義，屬西式風格，跟東華和廣華的中式建築截然不同。東院的正前方是一座長方形的主樓，後方左右共有四翼，呈放射式的弧形。院後四翼分別在1930及1932年加建，各翼設有獨立樓梯，可減低疾病傳播風險。從醫療設備而言，東院秉承東華的中醫傳統，設有中藥局、贈醫所、外科中醫贈醫所，同時提供西醫治療，備有先進的割症房（即外科手術室）、X光室、西藥房等等。由此可見，東院是一所中西醫兼備的醫院。

東院成立後，集善醫院繼續營運，直至1930年3月1日，才改為東院的分診所。事緣1924年東華議決接收集善醫院並改名東華東院，隨即在灣仔租賃利東街46號地下開設東院街症贈診所²⁴。集善醫院在東院1929年啟用後仍舊如常營作，原班人馬繼續留任，一切開支由東院負責。不過，集善醫院每日只開診4小時，年中支出所費不菲。為節省開支和便利之故，從1930年3月1日起，裁去集善醫院的司理1名（由東院副司理兼任）、中醫1名（由東院中醫輪值往返贈診）、執藥3名（由東院人員出任）和丁役1名（由東院人員出任）。每天早上東院中藥局派員到分診所工作，到下午3時回東院。新措施每月可為東院節省薪金120元、柴火10元，一年共節省2,424元²⁵。

24 創院九十週年紀念庚子年董事局編纂：《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創院九十週年紀念》，第三輯，頁3，（香港：東華三院，1960）。

25 《東華醫院庚午年徵信錄》（壹集），頁7A；蔡俊臣：《東華東院史畧》，頁20。



▲ 1929年落成的東華東院由巴馬丹拿設計，建築屬西式風格（圖片來源：東華三院文物館）

戰前東院的醫療服務

戰前東院負起了灣仔、銅鑼灣、大坑、筲箕灣等港島東區華人醫療的重責。根據戰前歷年的徵信錄和院務報告書，東院的求診人數不斷增加。中醫門診病人長期數以萬計，1931年已逾四萬人，而且持續上升，到1940年更超過十四萬。至於西醫治療，儘管大部分本地華人仍不信任西醫，但西醫門診人數在十年間也倍增，由1931年的1,200多人，到1940年已超過2,800人，升幅高於一倍。

縱然戰前本地華人對西醫缺乏信心，但對比十九世紀末已有明顯的改變。觀乎東院的情況，雖然1930年代中醫門診的病人數目是西醫的兩至五倍²⁶，但西醫的留院病人數目則遠比中醫的多。1931年，東院的中醫留院數目不足1,400人，西醫卻是中醫的一倍有餘（2,852人）。到1940年，西醫留院人數已是中醫的九倍，超過一萬人（表三）。再細看從1930至1935年的贈診比率，儘管求診者大多選擇中醫，但選擇西醫的人數亦逐年增加，由最初佔總求診人數的16%，增加至1935年的29%。以實際病人數目計算，選擇西醫贈診的人數更增加了三倍（表四）。上述數據反映，1930年代本地華人逐漸接納西醫治療，尤其涉及新型及嚴重疾病，西醫的即時療效或比中醫顯著，令戰前東院的西醫留院及贈診數字持續增加。

26 分診所的病人數字尚未計算在內。

表三. 東華東院求診人數，1929-1935、1939-1940

年	留院		門診			產科	戒煙	
	中醫	西醫	中醫	西醫	分所			
1929*	105	118	1,398	210	-	-	-	
1930	3,079		54,200			-	472	-
1931	1,345	2,852	45,831	12,471	-	667	-	
1932	1,872	2,697	45,930	14,298	46,779	581	-	
1933	1,956	3,266	54,004	17,809	64,926	785	177*	
1934	2,528	4,004	58,954	23,711	65,900	954	353	
1935	2,185	5,932	61,358	28,122	60,931	1,154	437	
1939	2,271	6,911	95,094	27,777	-	1,074	-	
1940	1,557	10,177	146,891	28,903	-	1,235	-	

註：* 1929年11月27日至12月31日

※ 1933年6月19日至12月31日

資料來源：《東華醫院暨東華東院己巳年報告書》、《東華醫院庚午年徵信錄——內附東華東院徵信錄》、《1931年度東華醫院及東華東院徵信錄》、《1931年香港東華醫院院務報告》、《1932年度東華醫院廣華醫院東華東院三院統一院務報告書》、《1933年度東華醫院廣華醫院東華東院三院統一院務報告書》、《1935年度東華醫院廣華醫院東華東院院務報告書》、《1940年度香港東華醫院廣華醫院東華東院院務報告書》。

表四. 東華東院中西醫贈診人數統計，1930-1934

年	中醫 (百分比)	中醫 (西分比%)	總數
1930	45,436 (84%)	8,764 (16%)	54,200
1931	45,931 (79%)	12,471 (21%)	58,402
1932	45,931 (76%)	14,298 (24%)	58,402
1933	54,004 (75%)	17,809 (25%)	71,813
1934	58,954 (71%)	23,711 (29%)	82,665

資料來源：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頁390-391，表1-3-7。

戰前東院設有產房、兒科病房、接生房、戒煙房、肺癆房等專科病房。東院開幕後不久便提供產科服務，並且開辦護士學校，培訓助產士。以往華人婦女臨盆在即，會找穩婆（俗稱「接生婆」、「執媽」）或家中有經驗的女性親屬協助生產。自十九世紀末，政府以至教會醫院均鼓勵華人婦女使用西式分娩方法，到醫院產子，並且積極培訓本地助產士，取代舊式的穩婆，提高母嬰的存活率²⁷。1920年代，東華的三間醫院陸續開辦護士學校。東院開幕翌年，產科便投入服務，並開辦護士學校培訓人才，及至1931年，三院統一培訓護士人才²⁸。戰前在東院分娩的婦女，除1932年外，數目均持續上升，到1935年更突破一千人（表三）。

東院是少有在戰前提供兒科服務的醫院。1930年代初，只有中華寶血兒童醫院提供兒科醫療²⁹；雖然東華、廣華、雅麗氏醫院、贊育醫院均附設嬰兒健康中心，但雅麗氏醫院及贊育醫院只招待在該院出生的嬰兒³⁰。政府位於灣仔的貝夫人健康診所（Violet Peel Health Centre），到1935年5月13日才啟用³¹。換言之，在1930年代初，本港的兒科醫療極之缺乏。有見及此，輔政司修頓的夫人（Bella Sidney Southorn, 1876-1960）在1931年提議東院增設小童病房，獲東華董事局接納，把東院三樓的女看護生宿舍（原本佔用三、四樓，後合併在四樓）改建成兒科病房³²。



▲ 1958年柏立基港督夫人巡視東華東院兒科病房（圖片來源：東華三院文物館）

27 有關香港的分娩改革，見Edward H. Paterson, *A Hospital for Hong Kong: The Century History of the Alice Ho Mui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Hong Kong: Alice Ho Mui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 1987).

28 有關戰前東華三間醫院的護士培訓，參見創院九十週年紀念庚子年董事局編纂：《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二輯，頁1-20。

29 位於深水埗的中華寶血會，把部份修院改建為兒童醫院，在1931年6月落成啟用，到1937年再改建成今天所見的寶血醫院。Cindy Yik-Yi Chu, *The Chinese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79-80.

30 "Report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of 1935,"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35*, p. M70.

31 迄至1937年，全港提供兒童健康服務的醫療機構，包括政府兩間嬰兒健康診所、瑪麗醫院、明德醫院、雅麗氏醫院、東華醫院、廣華醫院、贊育醫院、各區華人公立醫局、六所新界的醫局以及聖約翰救傷隊在新界的九個醫療中心。"Report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for the Year of 1937,"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37*, p. M41.

32 《1931年度東華醫院及東華東院徵信錄》（壹集），頁23b。

戒煙病房是東院的特色，始於1933年，其設立反映了戰前殖民政府對鴉片貿易的曖昧態度。香港因鴉片貿易而成為英國殖民地，直至太平洋戰爭結束後，買賣和吸食鴉片才屬違法。長久而來鴉片是殖民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1844年，香港政府立法實施鴉片專賣制度；1858年，政府修訂鴉片條例（Opium Ordinance No. 2），推動鴉片批發，驅使香港成為區內鴉片貿易中心。自始，鴉片利潤就成為庫房收入的重要來源。1858年，從鴉片得來的收益有4,508英鎊，到1882年躍升至45,985英鎊，增幅十倍，鴉片收益佔政府總收入的比率亦由7%增加到17%。到1889年，鴉片收入達94,257英鎊，是當年政府總收入的24%。1914至1918年，鴉片價格大增，每兩標準品質鴉片的零售價由8.5升至14.5港元，港府於是決定自1914年起直接銷售鴉片，令鴉片對政府庫房的貢獻有增無減。1915年，鴉片收益佔政府總收入45%，到1918年更達至頂峰的47%³³。

踏入二十世紀，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港府的鴉片貿易稍為收斂。先有1909年在上海舉辦的萬國禁煙會議，繼而在美國推動下，英國在1912年簽署海牙國際鴉片公約（Hague 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 of 1912），同意逐步壓制殖民地內部的鴉片加工與貿易，限制同時延伸至嗎啡與海洛英等危險藥物。1913年，港府落實關閉煙館，但仍可合法買賣鴉片。兩次大戰之間，國際聯盟着力打擊國際販毒活動，試圖結束各國殖民地鴉片專賣³⁴。在各方壓力下，港府成立戒煙病房，協助市民戒除毒癮。除國家醫院設6張戒煙病床，1933年華民政務司指示東院撥出12張病床，收留戒煙者³⁵。有意戒煙者，可直接到東院求診，費用由政府支付³⁶。1933年，在東院的戒煙病人有177人，翌年目增加一倍，共353人，到1935年，戒煙病人總數為437人（見表三）。資助市民戒煙而非禁煙，只是港府回應國際社會的權宜之計，未能真正打擊本港的鴉片貿易。

戰前東院的肺結核患者數目僅次於產科。肺結核又稱肺癆，早在1920年代已肆虐香港，而且死亡率高，直到1970年代才受控。肺結核傳染性高，加上香港地少人多，居住環境擠迫，大大增加患病的風險。根據1930年政府的醫務衛生報告，當年本港的死亡人數是16,268，結核病佔17.45%（肺結核12.25%，其他結核病5.2%），屬頭號殺手³⁷。到1938年，估計每十人當中就有一人患上肺結核³⁸。儘管肺結核在1939年成為法定需呈報的疾病，但官方的數字只是冰山一角，因為病人往往到最後一刻才求醫。換言之，病人在確診或入院前，已把病菌傳染其他人，即患病人數遠比公佈的多。

33 Harold H. Traver, "Colonial Relations and Opium Control Policy in Hong Kong, 1841-1945," in Harold H. Traver, and Mark S. Gaylord, eds., *Drugs, Law and the Stat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9-141, 143.

34 Ibid., pp. 141-145.

35 自瑪麗醫院在1937年落成後，國家醫院的戒煙病床也轉移到該院。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35*, p. 12;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the Year of 1937*, p. 12.

36 《工商日報》，1933年6月21日，版11。

37 "Hong Kong Medical & Sanitary Report for the Year 1930,"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the Year 1930*, pp. M22, M31.

38 Yip Ka-che, Wong Man-kong and Leung Yuen-sang,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8), p. 104.

作為中西醫兼備的醫院，東院肺結核病人可自選治療方法，但初期中西醫肺癆病房規格不一，容易造成感染。早期只有西醫肺癆病房把病人分隔，防止感染，中醫並無相關措施，因此觸發東華總理在1931年討論轄下醫院肺癆病房的安排³⁹。就東院而言，肺癆傳染症病房在1932年投入服務，最初留醫只有約20、30人，由於他們與無感染的病人共住一房，結核桿菌擴散風險相當高，所以東院把樓下病房改作肺癆傳染症病房，分隔肺結核患者與其他病人，減低傳染⁴⁰。

1940年的院務報告書揭示東院擬為專門醫治肺結核病的構思。時任東院義務胸肺科醫生的李樹芬(1887-1966)⁴¹，根據他從1940年6月4日至12月31日的觀察寫成報告書，提出多項改善建議，其中之一是集中三院的肺結核病人在東院接受治療。此舉既可集中資源照顧病人，提高經濟效能，而東院因為環境優良，有大量新鮮空氣，而且面臨掃桿埔，位置得宜，醫院前翼有大騎樓，空氣流通，有助病人康復⁴²。

另一建議是設立療養院，使更多肺結核病人可及早得到治療。在李氏觀察東院的七個月內，共接收了638位肺癆病人，當中395人最後因病身故，死亡率達61.92%，病人平均入院三星期便去世。由於估計八成病人入院時已屬重症，有些更患有其他疾病或出現併發症，可康復者甚少，但卻佔用了醫院絕大部分床位，令病情較輕和有機會治癒者未能及時入院就醫。因此李氏建議設立療養院，接收患病時間較長的病人，他們先在東院接受初部治療(如初級肺臟壓縮療法)，之後轉到療養院繼續休養，使醫院可騰出床位接收病人⁴³。

報告亦提議東院設立肺癆街症診所。由於當時香港肺結核患者眾多，而醫院床位有限，設立專門的街症診所，可令患者及早得到治療。報告書建議把東院的街症處改為肺病治療處，加上東院本身設有X光室，可為病人作檢測，再配合痰涎化驗，能及早為病人作出診斷⁴⁴。街症診所的另一優點是讓不願入院的病人得到治療。中華醫學會肺結核病學分會第一任會長吳達表(1904-1972)在《肺癆概說》提到，華人普遍認為肺結核是遺傳病，染疾會令家庭蒙羞，失去體面。鑑於家醜不外揚，大多數肺結核病人不願在患病初期求診，尤其不肯入院醫治⁴⁵。設立肺癆街症診所，稍可釋除華人病者的尷尬，及早求醫，以免病情惡化及傳染他人。1941年6月起，東院開辦每星期兩次的肺科門診，其中一位主診醫生正是吳達表⁴⁶。

39 以東華醫院為例，原先肺癆病房分中西醫設在仁恩房四樓南翼；經改動後，肺癆病房只分男女不分中西醫，而且合併一房杜絕傳染。〈東華醫院庚午徵信錄(東華醫院及東華東院一九三零年報告書第貳章建設)〉，載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頁362-363；〈一九三零至三一年度董事局會議紀錄(東華醫院董事局一九三一年三月廿七日會議紀錄—另設專門肺癆病房)〉，載何佩然編著：《施與受：從濟急到定期服務》(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頁190。

40 〈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度董事局會議紀錄(東華醫院董事局會議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會議紀錄)〉，載何佩然編著：《施與受》，頁190-191。

41 李樹芬1866年生於香港，1903年入讀西醫書院，並在1908年畢業，隨即遠赴愛丁堡大學深造。1910年代初，李氏回港執業；1922年再赴愛丁堡大學深造，獲頒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資格。李氏曾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1866-1925)，民國成立後，李氏出任廣東省衛生司長；1923至1925年，擔任孫中山的醫事顧問。孫中山逝世後，李樹芬返港行醫，並協助改組養和醫院。他曾出任多個醫學組織的會長，並且踏足政界，成為香港衛生局議員、定例局議員等等。自1940年6月4日起，李氏擔任東院的義務胸肺科醫生。有關李樹芬生平，參見氏著《香港外科醫生—六十年回憶錄》再版，(香港：香港李樹芬醫學基金會，2015)。

42 〈李樹芬醫生報告書〉，載《1940年度香港東華醫院廣華醫院東華東院院務報告書》，頁38。

43 同上。

44 同上，頁39。

45 吳達表：《肺癆概說》(香港：出版社，民35[1946])，頁9。

46 〈三院門診部之擴展及現況〉，載創院九十週年紀念庚子年董事局編纂：《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二輯，頁4。

吳達表醫生報告書

自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一年對於肺癆工作之進展報告如下：
壹、本院肺癆工作之進展，概有兩項，一、在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李樹芬醫生報告書

本院肺癆工作之進展，概有兩項，一、在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1940年度東華三院院務報告書》，刊有李樹芬醫生及吳達表醫生就改善東院肺癆病房提出的工作報告書（圖片來源：東華三院文物館）

李樹芬的肺結核病報告縱有先見之明，太平洋戰爭爆發令有關措施推遲實行。李氏在1941年4月21日提交報告書，同年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25日香港淪陷，展開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香港保衛戰初期，東院被英軍徵用作軍事醫院⁴⁷。淪陷之後，日軍又以東院作為英軍醫院為由強行接收，改為性病醫院⁴⁸。重光之後，1947年政府在灣仔的夏慤健康院開設肺癆診療部，為病人提供免費診斷和治療⁴⁹。1949年成立的律敦治療養院（Ruttonjee Sanatorium），是本港首間結核病醫院，由香港防癆會（後改名為「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負責管理⁵⁰。上述診所和療養院，落實了李樹芬報告書的部分建議，只是有關措施並非由東華或東院負責。1965年，黃大仙護養院（現為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落成啟用，專責處理延續護理及胸肺科疾病專科，尤其提供肺結核治療服務⁵¹。時至今日，黃大仙醫院依然為全港市民提供肺結核病的住院服務。由此可見，戰前李樹芬的肺結核報告書具相當的前瞻性，但因戰亂而延後落實。



▲ 1965年落成的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提供肺結核治療服務（圖片來源：東華三院文物館）

47 據東華三院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的會議紀錄，董事局當時已着手在東院的天台建造軍人廚房，可見董事局早已知悉該院將被徵用作軍事醫院。〈一九四一至四三年度董事局會議紀錄（東華三院董事局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會議紀錄）〉，載何佩然編著：《破與立：東華三院制度的演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頁96。

48 重光之後，港府重新接管東院，當年的東華主席以東院為三院之一，請求政府發還。1945年10月1日，軍政府總督夏慤中將（Vice Admiral Sir Cecil Harcourt，1892-1959）親臨東院主持復院儀式，藉此象徵英國重奪本港的民生事務。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編纂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百年史略》上冊，頁125。

49 《工商日報》，1946年11月30日，版3。

50 早在1931年，市政衛生局議員羅文錦（1893-1959）提議興建肺癆醫院，並獲政府接納，但庫房以資金不足為由，擱置計劃。1947年，港府同意把前皇家海軍醫院改建為專治結核病的醫院。由於前海軍醫院在戰時遭破壞，巴斯商人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1880-1960）捐款75萬進行修葺，醫院因此以他命名，並在1949年3月啟用。隨著肺結核病在二十世紀末受控，患者數目大減，律敦治醫院於是重建成全科醫院，在1991年重新投入服務；1998年更與毗鄰的鄧肇堅醫院合併，提供完整的急症服務及部分專科服務。《工商晚報》，1931年10月30日，版3；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https://antitb.org.hk/tc/about_us.php?cid=1，2021年9月26日；醫院管理局：港島東聯網律敦治醫院，https://www.ha.org.hk/visitor/ha_hosp_details.asp?Content_ID=100144&Lang=CHIB5，瀏覽日期：2021年9月26日。

51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原名黃大仙護養院，由始建於1954年的廣華護養院演變而成。原為殘廢病院的廣華護養院，因1958年廣華重建而要拆卸，政府於是撥出黃大仙沙田坳現址建院，落成後，大口環護養院及廣華護養院的殘廢病人將悉數遷往新院安置。到二十世紀末，為使公眾更清楚醫院的復康角色，因此改名為黃大仙醫院，並於1993年刊憲。〈大口環及廣華護養院〉，載創院九十週年紀念庚子年董事局編纂：《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二輯，頁3-4；李東海：《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頁58-63；醫院管理局：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https://www.ha.org.hk/visitor/ha_vistor_index.asp?Lang=CHIB5&Content_ID=100154，瀏覽日期：2021年9月26日。

小結

從華陀醫院的短暫歷史、籌建集善醫院，到後來由東院接辦，揭示戰前灣仔逐漸由城市邊緣脫變成商住區域。灣仔的人口不斷增加，1858年這處只有4,861人，到1931年人口已超過六萬。區內不僅倉庫和店舖林立，不同種族和國籍人士也陸續搬到這個區域。人口增加，對醫療需求有增無減，導致上述三間醫院相繼落戶灣仔。

要注意的是，不論華陀醫院、集善醫院還是東院均面向本地華人，皆因戰前殖民政府忽視了華人的醫療需要。儘管1860年代，港島區已有政府及教會所建的西醫院，但范阿為等人仍向政府申請建立華陀醫院，因為當時的華人不信任西醫，而政府的醫療體系亦無視華人的醫療需要。1920年代初灣仔街坊倡建集善醫院，源於自華陀醫院結束後，當地逾卅載沒有中醫院，而東華又遠在上環，貧病者無法負擔交通費用前往求診。上述中醫院的建立，反映戰前殖民政府漠視華人的醫療需要。縱然政府會批出土地和承擔部分建築費用，但主要是假手本地菁英及慈善團體提供醫療服務。

這三間醫院的興替印證東華是華人醫院和慈善組織之典範。華陀醫院與集善醫院均曾要求與東華合併，前者希望擴充為留醫院，遭政府拒絕後便要求與剛成立的東華醫院合併；後者甫成立之初就要求與東華東院合併，方便日後向全港市民募捐。由此可見，本地華人社群以至慈善團體均認同東華的影響力，所指的不僅是東華總理的社經網絡和動員能力，更牽涉政府對東華地位的肯定，否則政府亦不會指明集善醫院「亦應屬於東華醫院」。

最後，東院的求診情況反映了本地華人對西醫態度逐漸改變。不論贈診還是入院留醫，愈來愈多東院的病人選用西醫服務。對西醫態度的改變，涉及政府的宣傳之餘，東院作為一所現代化的醫院，擁有先進的西醫醫療設備，加上東院設有西醫贈診，能讓本地華人多接觸西醫治療，漸漸改變市民對西醫的態度⁵²。



皇后大道東上

與

洪聖爺與北城侯

伍志和

前言

洪聖是香港其中一位最多廟宇奉祀的海神，廟宇遍佈香港多區，當中有兩座洪聖古廟，即西貢滘西洲洪聖古廟及鴨脷洲洪聖古廟，已被列為法定古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的洪聖古廟（下稱「洪聖古廟」）是當區歷史最悠久的廟宇之一，它所處位置標誌著昔日的海岸線，具重要的文物價值，已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一級歷史建築。該廟亦是地方民間信俗的載體，其相關的洪聖誕亦是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稱「非遺」）項目。

2018年，東華三院在修繕洪聖古廟時，將廟旁被隱沒多年的「北城侯廟」石額重見天日，為廟宇再增添一層歷史意義。本文將會從文獻資料和廟宇建築的歷史訊息，嘗試梳理洪聖古廟和北城侯廟的歷史變遷，以及與地區發展的關係。

洪聖古廟簡史

洪聖是何方神聖？早年流行洪聖為唐代廣利刺史洪熙的說法，傳說洪熙通曉天文地理，經常幫助漁民商旅，歿後民間為他立廟奉祀，獲加封為「廣利洪聖大王」¹。但近年一般採納洪聖是「南海神」的說法，據清代屈大均《廣東新語》所載，在波羅江上有建於隋代開皇年間的南海神廟，南海神即火帝祝融，唐代對南海神的祭典甚盛，獲冊尊為廣利王²。至宋代更加封為「洪聖王」，明代則封為「南海廣利洪聖王」³。南海神廟位於今天廣州黃埔區，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每年農曆二月十三日的

1 〈神祇介紹〉，華人廟宇委員會網頁〈<http://www.ctc.org.hk/b5/deities.asp>〉，2022年2月15日讀取。

2 據（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載：「南海神廟在波羅江上。建自隋開皇年……自唐開元時。祭典始盛。嘗冊尊為廣利王。」，另「予嘗於南海祠書額曰南海之帝……南海之帝實祝融。火帝也。帝於南嶽。又帝於南海者。石氏星經云。南方亦帝。其精朱鳥……司火而兼司水。蓋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于中。而後火生于外。火非水無以為命。水非火無以為性。水與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為水火之帝也。」

3 黃競聰。2020。《簡明香港華人風俗史》，頁64

波羅誕均會舉行大型的賀誕活動，已列為國家級的非遺項目。香港的洪聖信俗亦與廣洲南海神廟有密切關聯。

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的洪聖古廟現由東華三院管理，其始建年難考，一般認為在廟旁刻有「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季秋吉立」的石構件是廟宇最早的文物，引證廟宇最早出現於1847年，此年份與洪聖古廟的土地記錄相符。洪聖古廟位於內地段第257號 (Inland Lot No. 257) 的土地上，該地段最早的記錄為1847年，年份與廟宇右側的石構件年份相同，而地段最早記錄的擁有人是一位名為李寬威的買辦。1865年，一位稱為李亞妹 (Lee Amoy) 的人用她在船街附近的土地，與李寬威交換內地段257號的土地及建於其上的廟宇和建築物。在1868年的差餉記錄中，李亞妹已被記錄為洪聖古廟的業權人⁴。其後，李亞妹再以1500元將廟宇押給政府印務員Delfino Noronha⁵。



▲ 現位於廟旁的石構件，是洪聖古廟最古老的文物（圖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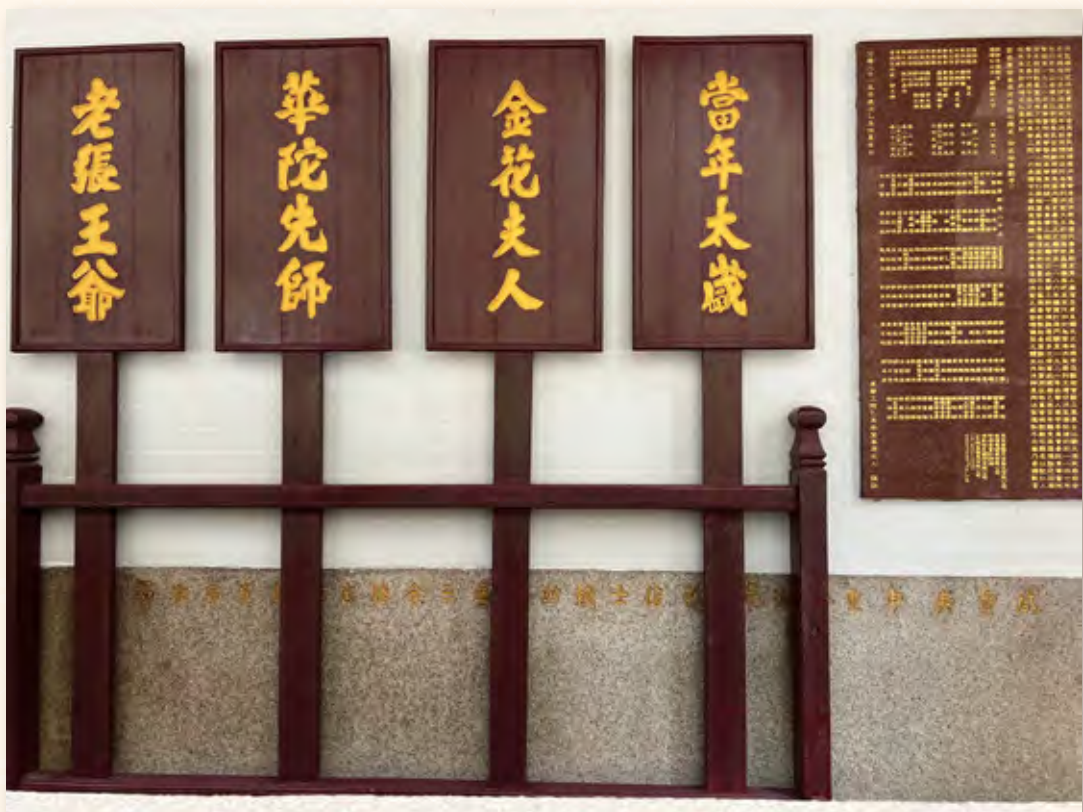
以上資料主要來自施其樂牧師 (Rev. Carl T. Smith) 對政府檔案的研究，而根據廟宇建築現存最早的紀年資料，即正門上方「洪聖古廟」石額的兩個重修年份，即「咸豐十年孟春重修」(1860年) 及「同治六年闔港眾善信重修吉立」(1867年)，兩次重修的相距甚短，而這兩個重修年份在廟宇內外亦可找到，前者另出現在正立面左次間的蝦弓樑及左次間的石牆基上；後者則可在廟內的鑄鐵鐘及石香爐找到。據現場觀察，1860年的重修規模甚大，並已基本形成廟宇的現貌，蓋因包括正立面的兩對石簷柱、蝦弓樑及相連的看樑獅子等石雕構件，以及正面兩次間的牆基石，皆是於1860年由善信捐獻。

4 Rates Assessment, *Valuation and Collection Books*, 1868

5 施其樂, 1999. 《歷史的覺醒 - 香港社會史論》, 頁177



▲ 洪聖古廟石額分別刻有「咸豐十年」及「同治六年」兩個重修年份，相距僅為七年，另下款為「樂邑鄧有元敬奉」（圖片由作者提供）



▲ 正面兩次間的牆基石是1860年由「樂邑信士賴四曾慶三合勝店敬奉」（圖片由作者提供）

為何洪聖古廟在短短七年後內要進行兩次重修呢？原來在1867年，政府認為洪聖古廟的狀況不安全，亦可能因當年的颱風引致廟宇後方有山泥傾瀉的危險，建築監督遂控告當時的廟宇負責人Poon Hee Chong，認為他讓廟宇出現「不安全和毀壞狀態」⁶，這應是洪聖古廟在1867年須再進行維修的原因。

及後，廟宇業權再度易手。根據1871年的差餉記錄，洪聖古廟的擁有人是當時三位顯赫的華人富商，即譚阿才、何錫（又名何斐然）及李玉衡（又名李陞）⁷。但自此年後的差餉記錄已沒有再出現譚阿才及李玉衡的名字，只有何錫繼續作為廟宇業權人直至1882年⁸，有趣的是，何錫早於1877年已離世。



▲約1870年的皇后大道東，右側為洪聖古廟（圖片來源：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

6 施其樂. 1999. 《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頁178

7 同註6，根據施其樂牧師的研究，洪聖古廟早於1869年已售予譚才、何錫及李玉衡。

8 Rates Assessment, *Valuation and Collection Books*, 1871-1882



▲ 洪聖古廟最初的三位擁有人中，何錫（圖左）及李玉衡（圖右）均是東華醫院倡建總理（圖片來源：東華三院文物館）

何錫是東華醫院倡建總理之一，是主要從事鴉片貿易的禮和洋行 (Lyll, Still and Company) 買辦⁹，亦有經營米業生意¹⁰。根據差餉記錄，何錫所擁有的建南號米行 (Kin Nam Rice Mills) 位於內地段第199號 (Inland Lot No. 199)¹¹，即約於今天適安街與聖佛蘭士街之間，甚具規模，且與洪聖古廟相近。

其後，東華醫院開始參與洪聖古廟的管理，這可能與何錫和東華醫院的聯繫有關，這方面仍需作深入研究。根據東華三院的檔案資料，東華醫院最遲於1906年已開始處理洪聖古廟的司祝開投事宜¹²。1928年，洪聖古廟正式由華人廟宇委員會委託東華醫院管理，至1931年東華醫院、廣華醫院及東華東院統一為東華三院，自此洪聖古廟歸東華三院管理至今¹³。

北城侯廟的盛衰

2018年，東華三院將洪聖古廟旁的「望海觀音」木匾移開後，重新展現「同治丁卯年仲冬吉旦」（1867年）的「北城侯廟」石額，為香港的魯班信俗撰寫了新篇章。無獨有偶，此石額的年份與鄰近石水渠街藍屋的「華陀醫院」石額年份相同，兩位行業祖師於同年出現於皇后大道東一帶，不知箇中有否玄機。

9 Carl T. Smith. 2005.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pp. 123, 225

10 劉智鵬. 2021. 《善道同行－東華三院一百五十周年史略》，頁9

11 Rates Assessment, *Valuation and Collection Books, 1868-1871*

12 東華醫院董事局會議記錄，1905-1906

13 資料來自洪聖古廟門外的2015年「灣仔洪聖廟重修碑記」



◀ 被「望海觀音」木匾遮蓋多年的「北城侯廟」石額於2018年重見天日（圖片由作者提供）

魯班一向被奉為三行的行業祖師爺，位於西環青蓮台的魯班先師廟一向被認為是全港唯一主要供奉魯班先師的廟宇，每年農曆六月十三日的魯班誕已成為香港的非遺項目¹⁴。

「北城侯」相傳是明朝永樂年間對魯班的封號，西環魯班先師廟正門石對聯亦提到「北城俎豆永薦千秋」。魯班一向被視為「三行」從業員敬拜的神明，三行即木工、打石及泥水。筆者嘗試從魯班信眾群的角度探索北城侯廟在皇后大道東出現的原因。

香港不少廟宇的建築構件都是由信眾敬奉，一般會在構件上會刻有捐贈者的姓名。洪聖古廟正面右次間蝦弓樑上記載廟宇正面看樑獅子、拱手掙角及朝皆人物等石雕構件皆由「泰源石店敬奉」，年份應為左次間蝦弓樑上的「咸豐拾年」（1860年），究竟此泰源石店是甚麼來頭呢？1865年，政府開始將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採石權分開招標。翌年，九龍半島為期一年的石礦場經營權由泰源石店的曾二獲得¹⁵，可見此泰源石店當時應具一定的規模。根據1879年及1880年的《香港政府憲報》，泰源石店的東主是曾二，店址位於皇后大道東下環街市（即約今天灣仔街市的位置）對面。從泰源石店送贈洪聖古廟石構件及其毗鄰該廟的店址推斷，打石行業很可能是洪聖古廟其中一批重要的信眾群。

14 《魯班先師廟歷史簡介》，香港廣悅堂 <<http://www.lopan-kyt.com/showroom/model/T0229-green/templateCustomWebPage.do?customWebPageId=1325231453578382801&webId=1299010730140030215&editCurrentLanguage=1299010730140030216>>，2022年2月15日讀取

15 何佩然。2018。《班門弟子：香港三行工人與工會》，頁16



▲ 左次間石樑上刻有由「泰源石店敬奉」廟宇正面的石構裝飾（圖片由作者提供）

此外，洪聖古廟正門石額及對聯下款刻有「樂邑鄧有元敬奉」，樂邑即廣東五華，香港昔日很多打石工人也來自五華。至於這位鄧有元又是何許人？筆者嘗試作出以下的推論。根據羅香林〈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蹟及其與香港建設之關係〉一文提及，其中一位承辦打石業的重要人物鄧元昌，原名酉元，亦名阿焦六，原籍五華，於上環文武廟附近開設元昌石行，由於他誠實幹練，獲得政府信任，故得以承辦大量石工，他與當時另一名打石富商曾貫萬亦有姻親關係¹⁶，鄧元昌於1887年離世¹⁷。說回敬奉「洪聖古廟」石額的「鄧有元」，由於「酉」與「有」同音，此鄧有元有否可能是上述的五華打石商人鄧酉元呢？

姑勿論洪聖古廟與鄧元昌是否有關，單就泰源石店對洪聖古廟敬奉的一眾石構件，已可反映十九世紀中期打石業與洪聖古廟的關聯。由是觀之，1867年在洪聖廟旁興建北城侯廟，以供奉三行祖師爺魯班的信眾群體很大可能就是該區的打石行從業員，希望魯班先師庇佑區內的打石同業。打石行業敬奉魯班的例子還有九龍東的「四山」打石社群，即牛頭角、茜草灣、茶果嶺及鯉魚門，由四山管理的茶果嶺天后宮內，就供奉著魯班先師。農曆六月十三日魯班誕當日，茶果嶺鄉民聯誼會仍會舉辦拜神、派師傅飯等傳統活動，不但延續魯班誕此項非遺項目，亦是當地打石業的歷史見證。

打石業除供奉魯班外，有研究亦認為由於打石與海上漕運有密切關係，故打石工人亦同時會供奉海神，如前述的茶果嶺天后宮，以及位於油麻地、銅鑼灣及筲箕灣的天后古廟，均有打石商人及商號的捐獻記錄¹⁸。按照此歷史脈絡，打石行業同時作為海神洪聖與魯班先師的信眾群體，亦非孤例。

16 羅香林〈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蹟及其與香港建設之關係〉，載《食貨月刊》1(9)，1971

17 Carl T. Smith. 2005.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pp. 115-116

18 何佩然. 2018. 《班門弟子：香港三行工人與工會》，頁57-60

北城侯廟的魯班信俗相信是隨著香港打石業的式微而被社區遺忘。先看看1979年華僑日報有關灣仔洪聖古廟的介紹：

……廟外走廊右首供奉社稷之神，其前為「敕封工部尚書魯班先師」神位，兩旁聯云：「準繩分曲直」；「規矩定方圓」。洪聖古廟旁有水月宮，門前上懸「望海觀音」，旁木聯刻：「座上蓮華，饒有西湖三月鏡」；「瓶中楊柳，分來南海一枝香¹⁹」……

可見在1979年以前，魯班先師的神位已遷離北城侯廟，安置於洪聖古廟旁供奉。北城侯廟亦改為以供奉觀音為主神的水月宮，原有的石額亦被「望海觀音」木匾遮蓋。隨後的一段長時間，信眾只知洪聖古廟旁是一所供奉觀音的廟宇，原來的北城侯廟卻被社區遺忘。可見廟宇和神祇的盛衰與地區發展有緊密的聯繫。

若談及民間信仰與地方發展的關係，洪聖古廟內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今天廟宇正門陣列著八個寫有不同神明稱號的高腳牌（或稱儀仗牌），當中有一位名為「花粉夫人」，相信是與早年灣仔春園街一帶曾是煙花之地有關。



◀ 澳門康真君廟內的花粉夫人像（圖片由作者提供）

19 蕭國健，〈香港灣仔之洪聖古廟〉，華僑日報，1979年2月1日

現時花粉夫人的神像置於洪聖古廟正殿右側的金花夫人神龕內，神像的面部呈紅色，較易區別。相傳花粉夫人會保佑女士年輕貌美，一般受風塵女士信奉²⁰，故花粉夫人的信眾群應與昔日附近的紅燈區有關。澳門的十月初五街康真君廟亦有類似的情況，該廟內亦有供奉花粉夫人，據說多年前在神龕旁還有一對聯：「花容增美艷，粉面妍嬌顏²¹」，可惜此聯今天已不復見。康真君廟附近的福隆新街正是昔日著名的紅燈區，據說早年的風塵女子常到康真君廟參拜花粉夫人，還帶備胭脂水粉作為祭品，至近年亦有不少艷妝麗人到康真君廟拜祭花粉夫人²²。可見洪聖古廟的花粉夫人信俗亦側寫了灣仔昔日的社會面貌。

石灣屋脊與塌廟事件

洪聖古廟正脊上的石灣陶脊造工精細，更是香港極少塑有製作人名稱的脊飾，陶脊上可清楚看到「李萬玉作·徐志穩·徐榮輝造」字樣。有趣的是，屋脊的年份為「宣統元年」（1909年），究竟當年為何要造一條新的石灣陶脊呢？原來與當年的廟宇倒塌事件有關。

據1909年6月5日士蔑報（Hong Kong Telegraph）報導，洪聖古廟的屋頂在當日約上午十至十一時倒塌，導致兩名善信及廟祝受傷，幸好當天不是重要時節，否則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亡。倒塌後的廟宇佈滿瓦礫，但廟內神壇卻絲毫無損。報導指倒塌原因相信是屋頂木桁狀況欠佳及早前的大雨所致²³。此屋塌事件正解釋了為何洪聖古廟的石灣陶脊的製造年份是「宣統元年」，即當年廟宇負責人在廟宇倒塌同年已在石灣訂製了現存的瓦脊，以進行修繕工程。

從建築訊息解構歷史發展

洪聖古廟依山岩而建，地勢較路面為高，為一進三開間建築，前設門廊。後方和右側青磚牆體與山岩融為一體，這些山岩相信是昔日岸邊的自然景觀遺存，甚具特色。洪聖古廟正前方有一堵花崗石欄板所擋，入口則設於門廊兩側，善信並非如一般廟宇由中軸線前方進入，此設計相信是為了適應廟宇初建成時前臨灣海的地勢，信眾僅可從廟宇兩側入廟參拜。此外，現存於門廊地面上類似石渠蓋的構件，亦可能是因廟宇曾是臨海建築的排水設置。

20 周樹佳. 2009. 《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頁231

21 同註18

22 黃文輝. 2021. 《澳門康真君廟》，頁76。

23 The Hong Kong Telegraph, 5 June 1909



▲ 洪聖古廟建於昔日岸邊的山岩上，青磚牆體與其融為一體（圖片由作者提供）

廟宇正面門廊以花崗石構件為主，明間石欄板的「雙龍戲珠」石雕甚精緻；另設四條配以束腰柱礎的石柱支撐門廊屋頂。左右次間的蝦弓樑、看樑獅子、拱手掙角等石雕，皆為泰源石店敬奉。步入正殿，面前為四個主要神龕，正中供奉洪聖大王，其左側為太歲殿及包公殿，其中包公神龕前另奉有一眾神像；洪聖大王右側主要供奉金花夫人，伴隨花粉夫人及和合二仙等神像。廟內可欣賞到山岩與建築巧妙地融合，地面則以傳統的方形廣東大階磚鋪設。

洪聖古廟左側相連著一幢樓高兩層、貌似戰前的「騎樓」建築，始建年份相信與北城侯廟的石額上的年份相若，即1867年。據一張約1915年的洪聖古廟明信片所見²⁴，當時的北城侯廟石額前飾有木彩門，門廊的金字瓦頂由一對石柱支撐，門廊屋脊上有灰塑裝飾，外觀有別於今天所見。主建築屋頂則為傳統的金字瓦頂，其形制至今仍基本保存。

24 鄭寶鴻. 2015. 《此時彼刻·港島東百年變遷》，頁91。



▲ 洪聖古廟及北城侯廟：兩層高的北城侯廟糅合中西建築元素，包括正面的騎樓及後方的木構金字瓦頂（圖片由作者提供）



▲ 約1915年的洪聖古廟明信片，古廟的外觀有別於今天所見，但其形制至今仍基本保存（圖片來源：鄭寶鴻先生）

現存建築的上層應為半開放式的外廊²⁵，並配以一系列方柱欄河，現被綠色的木窗圍封；下層向街部分則為俗稱的「騎樓底」，由一對方形石柱支撐上方建築，但這對石柱形狀與上述1915年明信片中所見的圓石柱不同，應是後來改建的。翻查土地註冊記錄，該地段在1923年有一份由當時業權人與政府簽署關於在政府土地上興建外廊的承諾書²⁶，內容包括規定業主須按照圖則興建外廊、確保外廊日後有妥善保養及容許政府人員入內視察等。按此推斷，現存的外廊應該於1923年左右加建。值得注意的是，此項加建正面外廊工程雖然移除了原來的瓦頂門廊和石柱，但主建築後方的金字瓦頂木結構設計卻仍保存至今。這種糅合西式建築元素的正立面，以及中式傳統金字瓦頂結構，充分展現二十世紀初香港中西文化交匯的社會文化脈絡。



▲ 北城侯廟上層外廊地面保留著二十世紀初流行的水泥花階磚（圖片由作者提供）

25 根據屋宇署的定義：「「外廊」與「露台」相似，在暴露於風、雨的位置，結構較容易被侵蝕而耗損，對公眾安全構成的風險一般較高。「露台」一般以懸臂方式由牆壁伸出，而「外廊」一般除了由牆壁伸出外，亦有支柱或結構牆承托兩側。」（資源來源：https://www.bd.gov.hk/tc/resources/faq/index_balcony_and_verandah.html）

26 Memorial No. 82589 of Inland Lot No. 257, Document records of The Land Registry Office, Hong Kong.

進入北城侯廟，地下有三個神龕，明間供奉主神觀音及魯班，左側為西方佛母和張王爺²⁴⁶，右側是城隍。沿旁邊的樓梯走往上層，正中供奉三寶聖佛，室內的傳統金字木桁屋頂結構仍清晰可見，地面則鋪以中式廣東大階磚。走到外廊，可看到截然不同的建築風格：屋面是混凝土平頂結構，地面則以水泥花階磚鋪砌，階磚花邊為黑、白、棕色的幾何圖案，保存狀況甚佳，相信是1920年代加建外廊時鋪設。上層室內與外廊兩個具不同時代特色的建築空間，充份展現廟宇的演變歷程，值得我們細味。洪聖古廟與北城侯廟可說是市區現存甚具特色的廟宇建築群。

結論

洪聖古廟是灣仔區的地標建築，不僅標誌著舊日的海岸線，洪聖大王的名號更成為其前方的大王東街及大王西街，具體反映昔日的地理面貌、地區發展和民間信俗。東華三院近年讓北城侯廟石額重見天日，重新喚醒已被遺忘多年的社區記憶。由於時間所限，本文僅可通過部分歷史檔案及現存建築遺下的歷史訊息，淺釋洪聖古廟的歷史及北城侯廟的興衰，當中有不少內容仍須繼續深化琢磨。筆者希望藉此文拋磚引玉，期待大家繼續追尋皇后大道東上洪聖爺與北城侯的有趣故事。



246 張王爺是掌管揀時擇日的神，據說西環魯班先師廟內其中一個神像便是張王爺。

鳴謝（按筆畫序）

丁新豹博士

伍志和先生

国立国会図書館

香港大學圖書館

香港公共圖書館

高添強先生

黃競聰博士

劉國偉先生

鄭寶鴻先生

盧淑櫻博士

鄺智文博士

1941年香港戰役空間史研究計劃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Libraries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George Watson's College

Royal Collection Trust

The Literary &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Newcastle

The Scottish National Photography Collection

策劃

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

版次

2023年6月第一版